CHANGSHA JIAOQUWENSHI

長沙郊區文史

4

长沙郊区文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建国前长沙市郊蔬菜产销概况……张若曦　李炎坤（1）

瘳家湾的租佃变迁……罗汉庭（8）

回忆解放前种菜生涯……黄三娭毑（10）

长沙市国营蔬菜试验农场前期概况……候迪葵（12）

长沙市蔬菜科研所的沿革及早期科研活动……彭冬忠（19）

湖南省高中学生军事集训杂记……刘敬业（24）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运点滴……凌翼云（27）

峥嵘岁月在清华

难忘的启蒙教育……杨建武　罗昭绣　刘振海（37）

战斗的革命文艺活动……金　式（40）

慰问流亡学生　营救被捕代表……廖典惠（42）

为民众服务　向民众学习……杨筱芳（44）

黎明前的游艺访问队……李俭安　胡彦章（46）

我们为市学联当联络员……刘甲柱（47）

联防护校迎解放……蔡诲文（49）

策划兴华中学学生运动的回顾……曾敬诚（52）

武杰杜寅阶……万天石（57）

先祖介祉公事略……………………………周仁济（62）
回忆父亲对我的书法教育……………………周昭怡（74）
我所知道的周介褐先生………………………柏柱臣（79）
先父罗庶丹生平………………………………罗书慎（83）
大江东去悼忠魂
——黄芝冈逝世十八周年祭…………………黄曾甫（88）
柳松严在长沙郊区……………………………万天石（92）
我在长沙郊区创业的情况…………………彭虞阶（96）
望城坡罗积庆号………………………………罗德钦（103）
淞沪血战亲历记……………………………王卓超（107）
一代学者鲁实先………………………………鲁传先（113）
重庆忆旧………………………………………罗大周（121）
寺庙生活的回忆………………………………胡一宗（127）

建国前长沙市郊蔬菜产销概况

菜地分布

长沙郊区商品蔬菜生产历史久远，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蔬菜基地逐步向外推移。一片片菜园变成城市，又一丘丘稻田变成菜园。民国初期，市内的一步两搭桥，小瀛洲、古稻田等地区仍有水塘、稻田和小块菜地。临近解放时，市郊菜土近8千亩，按当时40万人口计算，人平有菜土2厘。菜地分布，围绕城市呈环状向外拓展，大抵有近、中、远郊的区分。紧挨城区的开福寺、麻园岭、砚瓦池、老京广铁路沿线两侧、灵官渡、水陆洲、傅家洲及潆湾市（今潆湾镇）等地，均有常年菜土，也有极少的水生菜园，主产速生的叶类菜及茄子、丝瓜等瓜果类蔬菜。在离城稍远的新河、黑石渡、东屯渡、周家湾、赤岗冲、石马铺、靳江河等地，多数是水稻连作区，水生菜园较多，主产茭瓜、水芋、藕及瓜类等蔬菜。再沿城东、北两向延伸到较远处的浏阳河两岸的东湖、东山、谭杨洲（今黎托乡谭阳村）、史家坡、鸭子铺、陈家渡（今163医院处）以及湘江西岸的谷山南侧一带，多属稻菜轮作区，主产辣椒、生姜、萝卜、芽白及豆类等蔬菜。

地方品种

“白菜白一年，萝卜又相连，黄芽白打牙祭，冬苋菜又过年”。长沙市民中流传的这顺口溜，可知当年市郊蔬菜品种

较为单一。但在菜农生产的百来个品种中，也有不少深受市民喜爱：如仰天湖一带种植的肉丝瓜，枝蔓旺盛，进入瓜棚如入灌木丛中。其瓜条粗壮，蒂似肚脐，皮薄肉嫩，汁多味甜，吃来柔软可口。供应期能过百日。亩产约万斤。解家湾菜农周兴宇所种两亩丝瓜，每亩360蔸，枝蔓均长超10米，蔸产40斤，总产近3万斤。侯家塘一带种植的青荷包茄，形似荷包，皮色绿白，果实丰满，肉质细软。廖家湾菜农郭庆祥（原雨花亭乡红旗大队第6生产队队长，已故）种的青荷包茄，株高1.5米，株身4至5盘，株产20个左右，个大重达1斤。黑石渡一带种植的粉皮冬瓜，常与其它矮生作物间作，亩产近万斤，可算稳产、高产品种。菜农马玉田（原福安乡胜利大队队长，已退休）曾誉称“马冬瓜”，因种冬瓜个重达百斤而出名。东山镇一带种植的光皮辣椒，长圆椎形，皮光滑，果肉厚，味甜酸带辣，鲜食极为爽口。谭杨洲种植的泡椒，形似灯笼，剖开空心小，果肉厚实，味甜微辣质脆，鲜食最好。据当地老人杜福生回忆，该品种系本村李家湾菜农柳兴城于民国十五年时从南县乌咀引来，在洲上扩种，流传至今。湘江两岸种植的牛角辣椒，果长稍弯，上粗下尖，形如牛角，味甜脆辣，鲜食酱食皆宜。以上3种辣椒的供应期以牛角辣椒较长，泡辣较短，均达百日以上，亩产约4千斤左右。

另外，本地优良品种还有岳麓山一带的百合，东湖一带的脚板薯，小林子冲一带的乌金白（白菜）和近郊种过的黄花芥兰、香葱等，当时未能推广，大多惜已失传。

耕种技术

建国前，郊区菜农分散经营，工具简陋，技术有些保守。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也有不少经验可供借鉴：

菜农爱土如金，注意养用结合。挖土站在跳板上，避免把土踩紧。整土时尽量做到深（深耕）、细（细整）、平（面平）、松（松爽）、净（园洁），以保水保肥。三伏天翻土曝晒，直至透心过白，提高了土壤团粒结构，又达到了除草、杀菌、灭虫的效果，故有“七烤金、八烤银”之说。菜农又根据土质情况，采取挑塘泥、掺黄泥、换土间等办法，改良土壤。作物采取轮、间、套、混作多种形式，尽可能地利用地力。一年能出园两季以上的，有莴笋、豆角、红菜和小白菜等。

菜农都很注意选种、留种，看到哪家菜园品种好，总要想方设法“讨”来、“牟”来。当时莴笋留种最难，结籽时正是霉雨季节，将要成熟的苞子被雨水浸泡，再经太阳一晒，用指尖轻轻一捻，就变成了粉末。传说后经老菜农黄锡根试验，他留下少量种籽在春天播下，秧苗移栽后在霉雨季节生长，待扬花结籽已近伏天，不再霉烂。由此留下了“摘苞子（早莴笋结实成熟一个就摘一个）、留倒籽，你若不信我（莴笋种子）就死”的谚语。

当时生产条件差，夏菜多是露地育苗。菜农隔年冬至后便整土，撒下种籽，盖上一层猪粪渣，再用茅串复盖保温。育苗好坏完全取决于气候。有的菜农精心设计，利用木盘或其它容器育苗，根据室内外适宜气温端进端出，以防寒潮冰冻。菜苗长出后，移栽选晴天，栽完浇足压蔸水，有“干期

雨，万期雪，顶不上一瓢压蔸水”，的农谚。至于浇菜用端或用瓢；浇灌时用点（浇的部位在一点上）、用哧（谐音，浇的部位在一线上）或用泼（浇的部位在一片上）的手法，都要视菜土、菜苗的具体情况而定。在旱情严重时还用倒水，即将整担清粪水挑往菜地倾注。

用肥用药

建国前，郊区种菜用肥主要来源有三：一是从垃圾堆中筛选土杂肥；二是菜农户养猪积肥；三是购买人粪尿。近郊菜农积土杂肥多，远郊菜农有去枯饼行买菜饼作肥料的。当时城门四周都有大型的粪码头。如南门的培农公司，小吴门的振农公司，浏阳门的裕农公司，北门挖港子的惠农公司，草潮门的清平公司、太和公司都经营人粪肥。除此，还有小型的粪码头，如麻园湾甘姓经营的等。粪肥依质论价，每担半稠汤的人粪尿，其价相当2升米左右。装运粪肥，近郊菜农多用桶装肩挑；中郊运距较远，多用腰子桶装，放置独轮土车上推运；远郊如湘江沿岸及浏阳河下游沿岸的菜农，则用木船装运。

防治病虫害是采用土农药和土办法。菜农用巴豆子、水莽子根等毒品，加进朝天辣椒磨碎后兑水浸泡，拿稻草或竹桠枝扎成的小把子沾上药水，向有虫情的菜地洒下，杀灭菜青虫、黑壳虫、黄条跳蚤、蚜虫、水蛆等。萤火虫吃瓜类菜幼苗，较难防治。地老虎纯靠人工捕捉。菜地蚯蚓甚多，它是蔬菜的害虫，钻伤菜根，危害水土保持，菜农挖土时把它捉进桶里，倒入池塘喂鱼或作鸡鸭饲料，

上市销售

菜农办菜非常讲究美观，泥沙粪渣洗得干干净净，好次分开扎成小把。如用70——80斤小白菜分扎100把，当作一斤一把出手，买主仍很中意。蕹菜、木尔菜办出挂角、有摊叶；苋菜现鱼鳞甲；冬苋菜冬天有菜心，春天现叶子。瓜果和根块类蔬菜讲究分级，弯黄瓜、伤疤茄等外形差的菜，留下自己吃，不上市。但也有极少数菜农办菜不规矩，欺骗顾客。如有的办菜时装底盖面，以次充好；有的菜放入水中浸泡，增加重量出卖等等。

担菜上市所用工具，大致能辨别卖菜人身份和住处。近郊自产自销的菜农，大多一头用高系箢箕盛叶类菜，一头用钉边箩筐盛瓜果类菜；远郊稻菜兼作地区的农民，大多两头都用谷米箩筐；打过手的小菜贩子，用的是一对登系黄篾箩筐。

菜农零担上市销售，一看路，二探价。晴天路湿、雨天泥多的街巷，菜担子过得多，买菜的人就少，要选路走。同时，也掌握了蔬菜上市多少的情况，以便适当开价。除了走街串巷，还有进入菜市交易的。当时南门口、道门口、藩后街三大菜市搭有敞棚，进场交易不收费用。如果菜农愿趸批菜贩，一般都在大椿桥、南大十字路、复兴街、碧湾子、头卡子等自然形成的趸卖场所成交。远郊成批的蔬菜上市，如湘江两岸所产牛角辣椒，谭杨洲所产生姜、泡椒等，都有客商大宗采购船运远销。陈家渡、鸭子铺一带盛产萝卜，多为城区酱园收购腌制。

每年一、二月；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为蔬菜出园的三个淡季，上市品种少，菜价卖得起，销

得快，市场供不应求。而其它月份则不尽然。如白菜，淡季时贵如黄金，旺季时贱似狗屎，故菜农称之为“金狗屎”。价高时能卖到一斗多米一担，价低时只相当于价高时的十分之一，甚至分文不值，只好沤凼作肥料。菜农有言：“有人买是‘乌金’白，没人买是‘瘟神’白”。其他大路菜也有类似情况。有时，菜农清早挑菜进城，走街串巷大半天，还有不曾开秤的。有心计的菜农就挑下河，贱价卖给船户。

菜农爱坐茶馆，一边喝茶吃早点，一边聊天探行情。卖菜人之间互通情报，把蔬菜畅销说成“开头教”，滞销说成“开四（滞）教”。还用“局仗”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江、都、神、少、歪（读上声）、河、新、干、曲、许十音替代，不让局外人得知菜价的“机密”。

菜农生活

建国前，市郊居民以菜农户占多数。有本籍世代种菜为生的，有邻近各县农民陆续迁来的。他们绝大部份依靠租佃地主土地作菜园。租地一般每亩需交押金银圆一百块左右，年纳地租老库谷五担，年节还要向东家送礼。为了租得一份土地，有的菜农不得不倾家荡产，甚至忍受高利贷之苦才交满地租押金。遇到灾荒年月交不起租，常有被迫退佃的事。

抗战期间，长沙四战一火，市民疏散避难，十室九空。有的菜农避难回来，田土荒芜，房屋倒塌，家园须得重建；有些无法趋避留在市郊的，也因蔬菜销售不旺，生活难以维持，甚至有人不幸惨死于炸弹机枪之下。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菜农挑菜上街，扁担扎上挂个米袋。卖完菜，换回的是一把时刻在贬值的金圆券、银元券，仅够买上升把两升米，还不够一家人一顿吃的。有时遇上要流氓的菜贩子，欺负老实菜农，硬要打过手，弄得不好一担菜就被哄抢了。遇上“大老总”（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非常“客气”（买菜不还价），掏出一块烂板光洋（实值三、五角钱）买角把钱的菜，得找还他八、九角，反而赔了大本，还不如相送，做个人情了事。

至于日常生活，夜半起床办菜，凌晨肩挑上市，不避风雨；卖菜归来，又忙于锄园浇种，风吹日晒，终日辛苦。一年到头过着“升米一把柴”的生活，不得温饱。

（张若曦、李炎坤根据李惠兰、罗汉庭、黄吉清、楚海泉等同志的口述资料，综合整理）。

廖家湾的租佃变迁

罗汉庭* 口述

廖家湾位于古城长沙市郊东南角，东邻戏子公山（今省电力厅厅址），西接小林子冲，南近侯家塘，北靠南大十字路。此处原有大山一座，山土约80亩；大塘一口，水面约4亩；平地田土约60亩。早年均为地主廖三胡子（名字不详）管业，故命名廖家湾。

1919年，先父仲明公从长沙县东乡东山镇迁此安家落户。1939年我10岁时，亲眼见到此处稻田全部变成了菜土，业主也易为胡迪成。胡系衡山县人，当时为湖南大学土木系教授，人称他胡三老太爷。

1940年，私立子建中学建校于此处北端（今省机械研究所所址），购去菜地约20亩。其它土地由沈德生、罗桃村、罗仲明、郭冬生、吴振威、周镇云、黄辉亮、肖华林、周子贵、袁文鼎、唐怀志、吴大永祥、刘石云、吴四公、凌振录、袁四篾匠等16户佃种。这些佃户都是从浏阳、株洲、长沙等县区农村迁来，认为在省会长沙城郊种菜比在县区作稻田较好：除种菜、卖菜之外，还可挑河水、黄泥出卖；也可抬轿、打杠挣钱。活计比农村多。

胡迪成家不在此处，他雇了同乡姓李的跑庄收租谷，胡、李来廖家湾便住在沈德生或罗桃村家。租谷均按当时市场粮价折成银圆或纸币收取。我家佃种菜土亩半，先交押金银圆元，每年交租谷老扉11担半，这与邻近地主（胡达、李轨、夏胡子等）规定的租押相比，胡迪成则较之开通些。

1947年冬，胡迪成声言出卖廖家湾全部产业，但只卖给佃户，不卖给旁人。计价4千银圆，不退各佃户原交押金。消息传出，16个佃户当即集会，成立“合益堂”临时性组织，公推能写会算或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罗桃村、吴振威、沈满公（沈德生之弟）、郭庆祥（郭冬生之子）和唐怀志等五人负责出面，以合益堂名义与胡签订总契约。签约前，规定各户按租佃土地所摊价款，三日内全部筹齐，如数向胡交清后，买卖两方签约生效。签完总契约，合益堂旋又将山土80亩卖给乐生窑砖厂（该厂立即生产，直至1955年结束），卖价银圆两千元，其价款又按佃租田亩分摊给各户。然后，各户与合益堂签订分约，获得原有土地、房屋的管业权。至此，合益堂组织解散。

我家在签订总契约的前三天，为了筹集置业资金，四处央求亲友借贷，后以大加一的利息（借一百银圆一月付息十元），借来银圆300元，如期交给合益堂。一个半月后，我家将管业的一半土地转手卖给南站运输公司副经理顾友忠（安徽人，拟购地建别墅），得价款银圆280元。加上合益堂卖给乐生窑砖厂土地所分得的价款，再除去原借款300元，利息45元，两抵后，我家纯得银圆120元、菜地0.75亩和3间旧平房。象我家这样置业后又卖出部分菜地的，还有周子贵、刘石云、肖华林、袁四篾匠4户。

解放后，城郊进行土地改革，廖家湾 （下转11页）

---

*罗汉庭系长沙市郊区蔬菜局离休干部。

回忆解放前种菜生涯

黄三娭毑* 口述

我家原住湘潭县易家湾。民国元年（1912），夫君黄锡根毅然离开了那穷乡僻壤，来到长沙城郊谋生。他先后在上麻园湾地主楚必泉和王必昌两家做长工，作菜园。1918年，我带着长子也来到长沙。次年，锡根租种了王必昌在鄢家庄红莲塘塅上（今麻园湾小学校址）的亩多水稻田，改成旱土种菜。1933年，又改租了地主彭湘衡家在港子桥彭家老屋（今红旗区二片）的3.3亩水稻田，变成旱土种菜。1939年锡根病故。1942年我领着儿女们又回上麻园湾，改租了姓苏的地主（名字不详）半亩荒土种菜。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分得了1.2亩菜土，才在自家的土地上愉快地劳动。

锡根生前常对我说："只要长沙城里还有人，我们种菜的就饿不死。"他坚信勤奋种菜可以维持一家人生活。可是，替地主种菜作长工，受人盘剥，佃种地主土地，要交押、交租。如租彭湘衡的田，每亩得交押金银洋一百块。又如在日军进犯长沙，兵荒马乱的年代，冒着生命危险种出菜来，市民疏散了，哪有几人买菜吃？而交给地主的租谷一粒也不能少。特别是锡根病逝后，我拖儿带女，种菜、喂猪、纺麻……粗细活样样干，大儿子卖菜、卖黄泥，卖苦力的事都作。就这样一家人也难以糊口，不得不叫年幼的子女去藩台衙门吃了几个月的救济粥……回想当年起早贪黑种菜、卖菜不得温饱的日子，真令人伤心痛苦。

解放后，我的子女们有的继续种菜，有的参加工作成了农艺师。1985年，麻园湾全部土地被征购，结束了我家73年的种菜生涯。我已转为城市户口，住进了红旗区新建的宿舍，安度晚年。

（李、马记录整理）

* 黄三娭毑住红旗区4片29栋，今年87岁。

（上接9页） 原合益堂16户划分阶级成份，有8户贫农（上列置业后又卖出部分菜地的5户全是），5户自耕中农，2户富裕中农，1户富农。

（火原记录整理）

长沙市国营蔬菜试验农场前期概况

侯迪葵* 口述

建国后，长沙市城市建设日益发展，人口激增，为做好城市居民蔬菜供应工作，市领导决定在郊区新建副食品生产基地，成立一个蔬菜试验农场。

选址建场　制定规划

1959年7月13日，中共市委常委刘瑛、副市长王志强、市副食品生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副食品局）局长胡芝祥、副局长周汝聪、畜牧科科长姚荣刚、蔬菜科科长廖建华、农场科科长张永义等同志，到东郊万年红公社灯塔大队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我在该大队任党总支书记，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大队的情况。他们认为，此处东临浏阳河，西接京广线铁路，长（沙）浏（阳）公路纵贯全境，交通便利，且土质肥沃，地势平坦、便于灌溉。因此，同意在此处建场。

选址既定，市城市服务局立即成立建场办公室，由周汝聪、姚荣刚、廖建华、张永义、陈鼎强（市蔬菜公司副经理）五同志负责，制定规划，具体着手筹备建场工作。9月经上级批示同意，定名为“长沙市国营蔬菜试验农场”。划定地境为长浏公路以北，仍属公社所辖；以南则划归农场。其具体分界线是：东至浏阳河西岸，西起京广线东侧，南抵

* 侯迪葵系长沙市郊区交通局退休干部。

樟木坝，北止长浏公路。全境总面积约3400多亩，人口约4600多人。

建场初期，省、市拨给17万元资金。干部由市调配。周炳炎（原长沙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任党总支书记，我任副书记；王凯延（原金盆区区长）任场长，陈鼎强任副场长。农场场部设有四股（生产、供销、财会、畜牧水产），一办（政治办公室），下按种植类别设6个行政管理工区（试验、茄果、瓜类、种子、水生、根茎），工区设有主任、副主任。各工区下分若干生产队，队有若干作业组，组长都是队委。

投资建设　生产配套

原灯塔大队为产稻区，几乎全是稻田。农场成立后，立即带领群众，大抓农田基本建设。按照大农业田园化设施的要求，把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水田，改成排灌便当、成方成块的平整菜地。是年年底，又根据农场整体规划，先后建成火王（火炬村至王塘）、王高（王家巷至高桥）、高渔（高河堆至渔场）、东木（东屯渡大桥至木桥）、东花（东风钢厂至花桥）等五条横平竖直的简易公路，共长8.5公里，把6个工区相互连接贯通。各工区范围内所修道路，均可通行板车，直达菜地。全场地成块、路成线，交通网若棋盘，粗具田园化建设规模。

1960年初，农场建温室十栋，每栋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温室为砖木结构，顶部向阳面盖有玻璃瓦，背阳面盖有隔热保温层。寒天，室内置3个煤炉生火，恒温16～18℃。室外共划出12亩菜地，供作温床与露地栽培。管理温室工作

有专业队，直属场部领导。市副食品局聘请了北京四季青公社王永祥技师来场，指导温室栽培和培训技术干部。温室里曾试验过"北菜南移"和"夏菜冬种"，效果甚好。引进良种繁多。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培植出黄瓜、辣椒、蕃茄等新鲜蔬菜。

农场还建有两栋"千头猪场"，一栋在高岭庙（水生、根茎两工区交界处），一栋在试验工区。两栋的规模一样，每栋全长200米。高岭庙处的"千头猪场"空着未利用，"四清"后拆除了3/4，遗留部分现为东屯渡粮库；试验工区处的"千头猪场"喂满了猪，若遇有死亡或出栏，缺数由各工区调来补充。主管牲畜的陈鼎强日夜坚守猪场，精心设计制作出切碎、搅拌机。成担的青饲料通过机器切碎后，由传送带引入一个约摸10多平方大的池子里加温，加温时有机器在池中不停地搅拌。然后，饲养员将煮好的潲装上小车，推到猪栏前，把车上开关一拉，车门打开，潲哗哗流进食槽，群猪便争食起来。当时，我们把这叫作"剁、煮猪菜机械化，运潲车子化，喂猪自动化"。由于农场职工吃"大锅饭"和猪舍阴冷，缺乏科学饲养管理等原因，牲猪生长缓慢，且入冬后病死、冻死不少。尽管投资大，也难完成上市任务，更谈不上经济效益。只有两三年光景，这"千头猪场"便自行解体了。

引进良种　主攻渡淡

市下达农场任务是：均衡上市，日供新鲜蔬菜5万斤（占全市居民需求量1/8）。完成数量，保证质量（无泥无沙，鲜嫩可口），这是市领导对农场的具体要求。

农场与长沙市蔬菜研究所（该所设农场办公，我兼副所长，以下简称菜研所）互相配合，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发展有关种养业的副食品生产。在蔬菜方面，我市每年的四、五月和八、九月为生产淡季，菜研所主攻渡淡品种，提出"十秋十早"（即十个夏菜秋种品种，十个秋菜早熟品种）并引进外地良种，由农场提供经费、劳力和试验场地。生产的主要品种有：

蕃茄（又名西红柿）：农场曾引进早雀钻、粉红甜肉、牛奶等80多个品种，经试种亩产，早雀钻6000多斤，粉红甜肉4000多斤，牛奶3000多斤，以高雀钻产量较高，适应性强，一度成为长沙地区主栽品种。

洋葱：我市菜农原无种洋葱习惯，1960年春，农场从外地引进葱头100斤，在试验工区试种。至9月，采葱籽收藏。次年春将葱籽播下，出苗后移植，入秋收获亩产葱头2000多斤。试种成功后，立即向全郊种菜社队推广。从此，长沙地区不仅能大量地生产洋葱，而且也学会了收获洋葱的种籽。

油罐茄：农场试种的外地良种油罐茄，果实粗长，颜色紫红，亩产万斤，是渡淡的好品种。且较本地茄易于栽培管理，郊区菜农非常喜爱。自引进以来，一直延续至今。

茭瓜：我区茭瓜每年只产一季，而杭州"双季茭瓜"每年4、5月和7、8月均能上市，是渡淡的好瓜菜。其形状与味道均与本地茭瓜相似。因此，特地从杭州空运种蔸10草袋（每袋10蔸，约100斤）来场，植于水生工区，两季亩产4000斤，比本地茭瓜产量高出一倍。它在水生工区只种两年，竟被人连蔸挖掉了。现岳麓山乡部分村保仍留了这个品

种。

大葱：1960年4月，从山东引进红皮大葱头100斤，5月栽培，不到8月便能上市，亩产2000斤。本地种大葱，自此而推广。

另外，农场从上海购回"乌踏白"（白菜）种籽1斤，育苗移栽后，叶片生长平展地面，宛如大盘。它的肉质柔嫩，味甜而鲜美，实为白菜中姣姣者。惜亩产只千斤左右。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高质低产的品种，只是昙花一现了。

服务城市　保证供给

建场不久，场部生产股改为生产办公室。市蔬菜公司又特派梁国龙、谢××两同志驻场专抓蔬菜上市。每月初，场党委将上市计划下达各工区，入下旬，根据各工区完成情况再适当平衡调整，月底进行检查。生产队每日送菜有回单，当晚能总结全日上市数量。由于当时指令性的上市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如到月底尚有不能完成任务的单位，就是"短命菜"（未成熟的）也要出园。1960年10月，茄果工区完成任务还差1万斤，不得不把生长只七成的包菜、白菜、红菜连兜砍了。

农场的机械化程度很差。建场时只有1台25匹马力的拖拉机和4辆马车（水生、根茎、种子、瓜类四个工区各1辆，均无马，用牛拉）。以后每个生产队配置两部板车，蔬菜上市基本上靠肩挑人运。指定农场送菜的地点，绝大多数是城西区菜店，从城东郊到城西区约10公里，全劳力日运菜两次，每担百多斤。另有运输队直属场部，配、备8部板车，只运全场生活、生产物资。一次上市万斤的大户，才能

派上拖拉机运送。

农场道路未铺砂石，日久坑洼之处甚多，雨天运菜更是困难。1961年暑季，我向7352部队李副团长求援，他派出5辆汽车、10名驾驶员自带伙食驻场，无偿地运输砂石铺路。在王公塘（今市衡器厂址）山上采掘砂石，采掘者是市民政局收容的一批青壮年，由农场治安主任陈岳松带领劳动。另从生产队抽调一班人专门装卸车，这样一连干了两个月，火王路的施家老屋至樟木坝段和高渔路的王家巷至傅家湾段已填平铺好。

上市质量　要求严格

1961年冬某日下午，全市农场蔬菜工作会议在我场召开，市委财贸部副部长董晓波也出席指导。会后，董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俩顺便带车菜进城吧！"（因当晚我们要参加市委召开的蔬菜工作会议）我满口答应了，就在试验队拖出一板车菜，董在后面推着。菜送至城中长治路菜店。卸车后，遇上西区区委的两位马书记，邀我俩去黄兴北路"半雅亭"吃碗面，作为招待。用完面出来，我们急忙赶到市委大楼会议室。会议已在进行，市委孔安民书记正讲着蔬菜上市要保证质量。这时，市蔬菜公司肖经理，从他坐的藤椅下提出两把有泥沙和草屑的白菜，操着湘阴口音插话了："孔书记，你看这菜是猪吃的，还是人吃的？"孔书记接过一看，恼怒了，质问是哪里送上市的。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肖经理毫不客气地答道："是试验农场的。"孔书记急问："试验农场来人没有？"我应声慌忙起立。孔书记指着我鼻尖问："你到底是共产党的书记，还是国民党的书记？"又掐

着那白菜气呼呼地冲我来，“你吃！你吃！”面对上级正言厉色的批评，我沉默不语，反躬自问，羞愧难言。董副部长在场见状，替我讲情似的解释说：“关于保证上市蔬菜质量的问题，他（指我）今天下午在会议上还是很强调的……会后，他又送一车菜进城，板车还放在楼下坪里了……”会场渐渐平静下来了，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是年底，我和周炳炎同时调离农场，去市副食品局农垦处工作。1964年，按地名命名，该场改名为国营东屯渡农场。

（马晓辉　火　原纪录整理）

长沙市蔬菜科研所的沿革及早期科研活动

彭冬忠 •

机构变更情况

长沙市蔬菜科研所（以下简称菜科所）于1960年秋成立，所址设东郊长沙市国营蔬菜试验农场学堂园生产队。由农场党委书记周炳炎兼所长，副书记侯迪葵兼副所长。科研技术干部有胡博文、陈听生、解德贵、童希之（原都在当地农场工作）和我（原在长沙市副食品生产管理局蔬菜科工作）共5人，菜科所隶属长沙市副食品生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副食品局）领导，胡博文负责所里具体工作。

办所初期条件差：租用一栋农舍作办公室和住房，办公桌和床铺系工作人员从原单位带来的，吃饭在农场管区公共食堂搭餐。白天大家在试验田里参加劳动，或到人民公社搞调查研究；晚上遵守集体办公的制度，研究问题，交流经验，学习业务技术知识。湖南省园艺所张继仁老师（研究员）长期驻所与大家一起开题搞试验，长沙市科委农业科的同志也经常来所检查帮助工作。

1962年3月，菜科所和长沙市畜牧研究所、长沙市水产

• 彭冬忠系长沙市郊区科委农艺师。

研究所合并为长沙市副食品研究所，仍属市副食品局领导，科研所下设一室三组，侯迪葵任专职副所长，胡博文担任办公室主任兼蔬菜研究组组长，刘春初任畜牧研究组组长，欧阳明任水产研究组组长。所址最初在原菜科所内，5月2日迁北郊马栏山原省水科所旧址。这里条件比原菜科所较好，有一栋两层楼的办公楼和两栋平房宿舍，还有配套的厨房、食堂，试验场地宽阔，有20来亩耕地，有60来亩水面鱼池，还有一栋猪舍能养100多头牲猪。

三所合并后，有干部10多人，1962年下半年又调黄仲甫来所担任所长，石绍其为副所长，加强了科研所的领导力量。1963年，在南郊烂泥冲的湖南省植物园撤销，该园6名技术干部调所，全所已有20多人。

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是科研所最兴旺的时期。上级拨款建成蔬菜、土肥、植保、畜牧、水产五个试验室，其中以土肥试验室设备较齐全。还建起了一栋玻璃温室。试验工人20多人，其中，有原省水科所留用的3人，其余都是从综合农场鸭子铺和朝阳两个管区招收来的。

1972年文革期间，近乎瘫痪状态的科研所划归郊区领导，改名为长沙市郊区良种繁殖场，除了培育少量的水稻和蔬菜种子外，其它科研活动基本上已停止。

1975年，郊区良种繁殖场交市领导，更名为长沙市农科所，蔬菜科研份量不多。1976年长沙市郊区蔬菜科研所重新建立。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新所址设于南郊雅塘冲。1980年10月，市政府决定将郊区蔬菜科研所并入长沙市农科所，郊区蔬菜所技术干部调市所工作，恢复长沙市蔬菜科研所建制。郊区另设蔬菜技术推广站。

蘑菇生产的试验和推广

蘑菇生产是长沙市蔬菜科研所的处女课题。1960年下半年，所里曾派解德贵前往哈尔滨市参加全国食用菌生产培训班学习。但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所即被精简下放回家。1962年3月，所里又派胡博文、陈听生去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历时一个多月，终于把蘑菇栽培技术学成回来。所里同志对此兴趣浓厚，当即利用办公室一角建立了一个面积约1.5×1.5米大的无菌接种室，先用伏尔马林消毒，再用紫外线灯照射杀菌。因为买不起高压消毒锅，就在办公室外面的屋檐下垒起了一个大土灶，用蒸气进行消毒，24小时以后蒸一次，连蒸两次，基本上已把杂菌消灭。加上在接种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菌种培养时注意细心规范，第一批生产250多瓶种子，只有两瓶长了杂菌报废，制种成功率达99%。

第一批蘑菇试验性的生产栽培是在农民李六木匠的两间杂屋里进行的。两间房屋面积约280平方市尺，用竹子作架，分为四层，除留给走道之外，总共蘑菇栽培面积约1000平方市尺。生产场地解决后，所里从蔬菜农场调来梁国高同志专管蘑菇生产，他热心工作，善于总结经验，后被人们称为“梁四蘑菇”。在蘑菇培养料上，曾用牛粪、奶牛粪、马粪、猪粪、鸡粪等作过试验对比，以奶牛粪最好。当时，长沙地区正在抓发展奶牛生产，这与发展蘑菇生产正相吻合。在蘑菇栽培管理上，天热时喷井水降温，寒天用壁炉生火加温，保证了菌丝生长适宜温度。发现了杂菌滋生就及时挑除和用药消毒。因此，培育出来的蘑菇又白又肥，产量每平方市尺1.5市斤，接近上海的产量水平。长沙蔬菜市场初次见

到菜科所产的蘑菇，争先抢购。当时来所长期定购的有长沙饭店、湘江宾馆、省委招待所和几家高级餐馆等单位。与此同时，菜科所还在办公室旁的一间屋里试栽香菇、瓶菇、木耳，都获成功，并有少量产品。

此时，上大垅公社等单位纷纷要求菜科所推广蘑菇栽培技术，其中搞得比较好的单位有上大垅公社和水陆洲天伦造纸厂。所里曾派胡博文、陈听生和我带着菌种一起去水陆洲天伦造纸厂指导操作，以后，这里发展为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的试验场地。上大垅公社则由余国辉负责，该社栽培面积比菜科所大，产量也比菜科所多。

大量引进蔬菜新品种

五十年代长沙地区蔬菜生产的品种单调，新鲜品种依靠外地贩运进来，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数量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当时，我负责主持大量引进外地优良蔬菜品种这个课题，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科研单位建立了种子交流联系网络，还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南昌、北京、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昆明等十多个城市订了协议，双方交换本地方的良种。菜科所曾向全国引来120多个蕃茄品种，通过试种，选出了早雀钻蕃茄进行推广。在选择秋茄子品种时，长江以南各主要城市的茄子品种几乎都引来进行比较，最后选择了衡阳油罐茄作为本地秋茄子的当家品种。

为了加快试验推广进程，在研究方法上也作了一些改进：第一年把大量的新品种栽到观察圃里进行观察与把一些较有把握的品种按品比要求进行试验结合起来。第二年把筛选出来的1—2个当选品种种到生产队去进行栽培试验、生

产示范和组织群众评议推广结合起来。这样，一个新品种从引进到推广只需2—3年时间就够了，比常规试验推广时间缩短了1—2年。

由于大量的引进推广外地优良品种，长沙地区蔬菜品种结构起了变化，六十年代明显地优于五十年代：一是一些种类的熟性配了套。如茄子，原本地仅有中熟的白荷包茄，菜科所试验推广了晚熟品种——衡阳油罐茄。另外还有广东青皮迟冬瓜、马尔早萝卜等；二是增加了许多淡季上市的新品种，缩小了本地历史性的蔬菜淡季。如春淡上市的鸡心包菜、四月曼白菜，秋淡上市的秋黄瓜、秋茄子、秋云豆、广东青皮迟冬瓜等；三是更新了一些蔬菜新品种，如高产的卜地尖早辣椒取代了本地矮树早辣椒，优质的株洲长白苦瓜取代了本地短白苦瓜，上海青白菜取代了本地迟白菜等；四是增加了本地花色品种。如上海黄狼南瓜、广东槟榔芋、杭州双季茭瓜、四川榨菜等。

此外，科研所在不时栽培、丰产技术研究、病虫预测预报和防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推广应用了滴滴畏、乐果乳剂等新农药，有效地防治了本地区斜纹夜盗蛾、黄曲条跳岬、蚜虫的严重危害。

湖南省高中学生军事集训杂记

刘敬业*

1935年春，我参加了湖南省高中学生集训总队举办的第二期军事训练。训练的地址是在古城长沙经武门外协操坪侧49标营房（现长沙东风体育场及省展览馆地区）。营房前有卫门，马路两旁系菜农园田；营房左有粤汉铁路和便河经过，右为杜家山大片菜地。协操坪四周梓、槐混交，遍地萋萋芳草，环境优美，实为练兵习武理想的场地，

湖南省高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始于1935年春，之后三年，即至1938年，每年上半年均举办了一期。每期时间约半年，共举办了四期。到第四期时总队已迁至南岳圣庙。前三期总队长是省主席何键兼任，第四期总队长是省主席张治中兼任。第一期副总队长有两人，一为何浩，一为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只挂名）。第二期副总队长是蒋肇周，第三、四期副总队长是中央军训部派来的施则凡。副总队长都挂少将军衔，担负实际工作。

我在集训总队时，编入二大队七中队三分队，担任第七班的副班长。同学是来自全省高中（包括师范、农、工、商

---

* 刘敬业系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乡退休干部。

职高等）学校一年二级和二年一级的男生。当时余克剑任总队附，总队部设有训练、政治、总务、医务等处，还有一个军乐队。总队下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个班。总队附和大队长均为上校，大队附、中队长均为中校，中队附为少校，分队长为上尉。我们的中队长张民宜曾在保定军校毕业，曹分队长是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全分队约有140多位同学。另有一些矮小、体弱的同学则另行编队，照顾他们不担任执勤任务和军风纪卫兵。两个中队分驻在一栋营房，楼下为教室、食堂，楼上为寝室。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学习德式步兵操作，从基本动作学起，直到营教练为止。每个同学发有步枪（或马枪）一支，子弹带一根，刺刀一把。每天早晨和下午四点以后，在操场进行约一小时军事训练，训练完毕，全总队集合分别举行升降旗仪式。上午和下午在课堂学习，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用测绘、阵中要令、筑城与防御、兵器学、战时救护以及政治等项课程。每星期进行一次阅兵式练习。还请省技术大队的教官，教给我们国术、翻杠、劈刺、扑击和器械操；在50标19师骑兵旅学习骑术。我们曾进行过三次实弹射击训练，每次每人发射子弹三颗。也经常在夜间紧急集合，行军往返30多里。白天课堂学习外，有时出发到郊野山地作战演习，这些，同学们感到十分惬意。

在生活方面，每逢星期六为全总队大检查。星期天放假，晚上八点前必须归队。各中队都有炊事班，雇用炊事人员，每日由同学轮流担任监厨和采买。饭前饭后集合排队，连同用餐只有五分钟时间，生活、学习都比较紧张。

中央政府军训部和训练总监部经常派员来总队检查工作，向大家作精神讲话。他们来必检阅，大检阅在协操坪，小检阅在49标内操坪。毕业前夕，军训部派员来队监督各项考试，并举行大检阅。这一期，我省被评为全国学生集训第一名。当时胡宗南率部经过长沙，胡与总队长商洽，欲将第二期毕业的同学全部调拨给他，作为西安军校第八期毕业学生，分配到他所属部队充当下级军官，遭到总队长的拒绝。毕业那天，总队长赠送每个同学佩剑一把，徽章一枚，作为集训纪念。

在日军疯狂侵略我国的年代，我们青年学生振奋精神，救亡习武，生活紧张、严肃而又活泼，既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又学会了一套杀敌的本领。总之，受训时间虽短，收获却是很大。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运点滴

凌翼云*

1947年春，我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入63班（后调整班序为92班）。那时，抗日战争结束已一年多。学校从安化桥头河（今属涟源县）迁回长沙。由于原校址书院坪被国民党政府盖起了陆军医院，学校便暂迁到原省高级农校在左家垅的校舍（今湖南艺术学校）。教学大楼高耸在左家垅西边的高坡上，沿坡上可达云麓宫。这里，北邻湖南大学工、理、政、文诸院，南连湖南大学商学院和清华中学（今中南工业大学处），隔左家垅小街与岳麓中学东西相望。

沉寂的校园

当时，一师规定，新生入校要经过一星期严格训练，强调树立专业思想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以及“戡乱时期”种种禁条。学生蓄发也有“男不过寸，女不过耳”的规定。

由于师范学生的学、膳费由政府开支，一师的名教师多，是个知名度较高的学校，考入很不容易。我和许多同学是经过县里初试，学校复考才取录的。同学多是贫寒子弟，有

* 凌翼云系湖南省戏曲研究所调研员。

不少是从教几年后，深感知识不足再来求学的，都想学点本事好立足于社会。新生训练周中，我们听到高一届61班某同学被国民党政府抓走的事，还参观了校内几大间的图书库，几大间的生物标本室，几大间的化学仪器室和几十架风琴。平均两三个同学有一套仪器做实验，有一架琴练奏。课后，同学们都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乃至赫胥黎、达尔文、马尔萨斯，叔本华、杜威、弗洛伊德、巴甫洛夫、高尔基、鲁迅、曹禺、巴金的书都有人读。1948年下期起，期期增辟阅览室，仍然座无虚席。

1947年，三青团在学校公开活动，有办公室，公布过干事长、区队长、分队长名单。1948年，三青团的公开活动不见了，却出现个湖南青年互助社一师分社，他们的头头是当时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刘修如，互助社活动分子在学校推销省政府社会处办的杂志《社会评论》。参加他们活动的人很少，大多数同学仍是埋头读书。

学生组织只有两个：食事会和同乡会。食事会办伙食，也负责热水供应。公家发的膳费很低，物价又天天涨，办好伙食有困难。各班选出两个食事代表，再推举食事会负责人，常规是选二年二期的同学担任，具体管食堂，管伙食，管工友；选三年一期的同学担任食事会监察，监督食事会工作。食事会除管伙食以外，每期还组织全校性的迎新和欢送毕业班同学的活动各一次。这些活动大多是游艺晚会和“打牙祭”。游艺会的内容有看湘剧、电影，也有同学演出话剧，如《升官图》等。1948年下期，我和同班同学高卓群（在益阳市二中工作）被举为食事会负责人。这期迎新送旧活动中，有一次是组织进城到联华剧院（今湖南剧院）看演剧六

队演出话剧《孔雀胆》。同学们也曾经排过话剧《沉渊》。同乡会多以县为单位建立，同县籍的同学都参加。有长沙同乡会，宁乡同乡会，湘乡同乡会等，我参加了湘潭同乡会。同乡会的活动一般也只有迎新、送毕业同学两次，多是开茶话会、合影；有的还印了同学录或校友录。平时，同乡同学间的交往甚多。校内各同乡会和各县的一师校友会也有联系。社会上的小学教师有所谓长师派，一师派，无非是争饭碗。同学们毕业后进入社会，便可以利用同乡会作为谋职业的媒介。因此，同学们对同乡会比较关心。

到了1949年，由于物价飞快上涨，伙食日差，再加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猛，国统区以学生为前导的民主运动蓬勃高涨，一师同学在“死读书，读死书”的氛围中猛省，关心起窗外事来。终于冲破重重禁锢，投入长沙市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洪流，成为长沙市学生运动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七”是转折点

1947年南京、天津发生“五·二〇血案”后，湖南大学、清华中学同学来一师串联，发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遭到了学校当局的阻挠和破坏。同学们目睹这次示威游行盛举，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口，呼吸到新鲜空气，关心起时局来。

1949年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和民主力量集会抗议，长沙的学生准备在4月7日游行示威声援。湖南大学、清华中学同学来一师联系，因没有学生自治会，群龙无首，再加上学校阻挠，效果不佳。他们

便利用亲友、同乡等多种关系，一批又一批到一师各班级活动，终于把一师同学发动起来了。4月5日，每班选出5名代表，召开全校学生代表会议，我被选为代表之一。经过班代表会的激烈争议，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决议，参加“四·七”游行，同时选出3人的主席团，组织这次游行活动。这3人主席团是：61班周树勋（现名周宇清，航天部北京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龙治平（安化县退休小学教师）和我。我们按游行大会布置，要求食事会在4月7日提前开早餐，并给游行同学发馒头当午餐。

4月7日凌晨5点多，同学们听到钟声起床、吃饭，整理队伍出发。除安排了一些同学守校外，全校10个班（60--69班）300多同学中有200多人参加游行，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队伍以横幅、校旗为前导，人人手执写有标语口号的三角小纸旗，敲打着两套带有笛子锁呐的锣鼓，从左家垅出发到湖大操场，和湖大、清华、岳麓、含光学校同学汇合后，从䕫楼口渡过湘江到中山公园（今青少年宫）参加示威游行大会。一师同学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受到兄弟学校同学鼓掌欢迎。会后，我们的队伍游经中山路、蔡锷路、中正路（今解放路）、黄兴路、南门口、惜阴街，经灵官渡过湘江回左家垅。这天，人人兴奋，直到晚上躺上床后，才感到腰酸腿痛。

“四·七”以后，长沙市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争取真和平联合会（即市学联），一师被选为执行委员，65班钟振龙（湖南师大外语系离休），68班夏远鹏（郴州地区劳动局工作）两同学代表我校参加市学联活动。原参加“四·七”游行的主席团及有关同学，暂时都做学联分会的工作，由龙

治平分工联系学联。这段时期，同学们情绪高涨。清华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尚同（现任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常与我们来往交谈，帮我们出主意。学校开展的很多活动，得到了清华同学的支持与帮助。

接着岳阳发生了镇压学生游行的“四·一三”惨案，长沙市学联决定在4月24日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支援岳阳同学。我们写标语，贴横幅，有的人忙通宵，准备参加示威游行。22日传来消息：渡江划子多被扣到湘江东岸，只剩几只划子渡江。23日进城回来的同学说，湘江中已看不到几只划子了。24日凌晨，我们才接到市学联通知，改游行示威为罢课三天，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成立学生自治会

“四·七”游行和“四·二四”的准备游行过程中，同学们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各班为此选出班代表，在班代表会上产生了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推举周树勋和64班王大庄（省煤炭工会工作，已退休）等起草自治会章程。学校当局对成立自治会一直压制、阻挠。周、王等几次找校长熊梦飞谈判，迫于解放军渡江和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再加上同学们以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作依据，据理力争，学校当局才勉强同意了。按一师自治会章程的规定，主席由同学直接选举，但候选人必须有40位同学联合提名。被提名的候选人有5位同学。在提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助选团。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助选团张出助选墙报，一时民主气氛浓厚。第一次大会选举主席，票数分散，没有选出。第二次大会选举时，我这个没有参加竞选的被提名为候选人之

一，得票最多。我和龙治平被选为自治会干事会正副主席，周树勋当选为自治会监委会主席。自治会设总务、文书、学术、文体、联络等股。联络股主要是与学联及其它学校联系，正副股长是驾轻就熟的钟振龙和夏远鹏。从此，学生自治会和学联一师分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龙治平仍多联系学联，我多管校内。

5月初的一天，全校同学聚集在大礼堂，鸣鞭奏乐，隆重召开自治会成立大会。湖大、清华、一中、岳麓等学校的自治会或学联派代表来祝贺。在学生自治会的影响支持下，我校工友会成立。不久，校工会扩大为教职员工会，教师、职员都参加了。

社团如雨后春笋

"四·七"以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活泼代替了往日的沉寂，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那时有两栋教学楼：60——63班在老楼，64——69班在新楼。在老楼活跃的社团是61班吕平安（现浏阳城北中学教师）、熊梦剑（岳阳市政协副主席）等组织的改造社，62、63班的亚风学社。新楼活跃的社团有64、65班的经世学会和进取社等。这些社团都公布了自已的章程，刊出自已的墙报。

亚风学社是成立较早的学生社团之一，最先发起人是郭镇球（后改名言铀，地下团员，现为中共株洲市纪委顾问）。我和他同班，平日较接近。"四·七"以后，他找我和黄子健（后在湘阴县一中任过校长）等酝酿成立社团。亚风学社是郭取的名，章程主要由郭起草。初成立时只有十来人，都是63班的，选举我任总务股长，郭镇球任学术股长。总务股对外；学术股组织讨论，出版墙报。后来社员增多了，63班的仍占多数。改选了班子，郭镇球被选为总务股长，黄子健当选学术股长。亚风学社的主要活动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出墙报。刊名《水火》，以反对正统观念，变革校内沉寂状况的面貌出现。第一期便发表了郭镇球，黄子健和我等社友撰写的打倒孔家店，提倡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民主）等方面内容的文章。

二、油印《土地改革法大纲》、《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城市工商业政策》等文件。这些文件是郭镇球找来的，同学们轮流刻写、印、寄，很多事情利用晚上做，纸和邮票是大家凑钱买的。寄发的对象是社友们各自的亲友。

三、传发新闻。每天，我们把郭镇球和另一位同学从湖南大学某处取来的新华社电讯稿，还有市学联送来的学运消息，以《快讯》标题，毛笔抄写，张贴在礼堂外墙上，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后来，学生社团发展到20多个，便成立了一师社团联谊会（简称社联），郭镇球当选为社联负责人。他曾代表学校社联和清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联合翻印了毛泽东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铅印32开本，书上没有署出翻印者。

河西四校游艺访问队

当时，宋扬（地下党员，已离休）在清华中学教课，他传播了许多进步歌曲和健康的民歌。朱尚同曾与我们筹划，邻近几个学校共同成立麓声合唱团，由宋扬任指挥。一师不少同学参加了，到清华中学练过歌。不久，在这个合唱团的基

础上，成立了河西四校（湖大、清华、一师、岳麓）游艺访问队。一师同学参加的有王庆龄（现名王正之，石家庄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长祥（湘潭钢铁厂物资部工作），王克俭（昆明冶炼厂高级工程师）、汤笃平（省科委处长）、吴传朴（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二中教师）、黄雄厚（湘潭市总工会工作）和钟振龙等。这个队共有十多人，队长是清华中学的李俭安（湖南农学院土化系副教授）。他们排练了十多个小型多样的节目，到湘江东岸的大、中学校演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动员大家留校护校。一师的节目土风舞、双簧现还留有剧照。学校食事会负责队里同学的伙食费，学校自治会拨出了十来块光洋资助这项活动。

在麓声合唱团、四校游艺访问队的影响下，民族歌舞和解放区的歌曲在一师传播开了。自治会和一些社团还邀请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同学和演剧四队、六队演员来教歌教舞，学歌学舞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一期，只有一个女生班，女生宿舍里空出的几间寝室，便是学歌学舞的场所。有农作舞、锄头舞、西藏舞、蒙古舞、秧歌舞、踢跶舞……一天到晚，敲锣打鼓，絃歌不绝。曹安老师（女体育老师，省体委退休）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王庆龄、王长祥，王克俭和我，搜集了当时流行的进步歌曲、民歌、舞曲共31首。加上《秧歌舞讲话》，由王长祥设计封面，以《光明的象征》为书名，用北风社的名义，在公益书店印刷工人的支持下，铅印成32开本歌集，发行了千多册。这本歌集的第一首是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雄鸡高声叫》，还有端木蕻良为北京解放写的《北京城》（龚务圆曲），《生产大合唱》的选曲《二月里来》、苏联歌曲《保卫你呀亲爱的母亲》，以及《西藏舞曲》、《草原情舞曲》、《嘉戎酒会》、《农作舞曲》等。

联防、应变

5月2日、6日、10日，市学联连续发出3份《告同学书》，号召加强团结，"集中全部力量积极开展应变工作"，"联合各界分区联防"，要求"一切工作都要放到团结应变这一中心目标上"。一师成立的第一个应变组织是巡逻队，由63班张汉中（现在冷水江市交通局工作）任队长，队员们主要在校园内巡逻。不久，师生工友一起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开始清理和登记校产。这时，武汉、南昌相继解放，岳麓山下不时有国民党残部和散兵过境。一师和清华、岳麓中学的同学和左家垅的农民组织在一起，划定区域轮流巡逻。

当时一师还组织了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夜校教务主任由64班肖贵麟（在湘潭卫校离休）担任。我们年级参加夜校教课的有王长祥、王庆麟、李镜光（株洲建筑公司退休）和陈克生（后去北京工作）等。他们和农民的关系很好，现还留有当年的合影。

营救钟振龙

6月12日、市学联在局关祠艺芳中学（今市14中学）召开执委会，作为执委和一师代表的钟振龙、夏远鹏参加了这次会议。下午，我们听说特务们捣乱会场，抓走了几名代表。晚饭前，夏远鹏回校说，在会议进行中，发现室外来了不少身份不明的人，猛然冲进了会场，斥问谁是主持人，问了一阵问不出名堂，就把正在发言的龙汉河和面前摆有文件

的钟振龙（负责管市学联文件资料）抓走了。同学们得知真实情况，后曾多次请求校长熊梦飞和有影响的教师周士钊（解放后曾任副省长，已故）、魏先朴（已故）出面营救。正在营救龙汉河、钟振龙的日子里，又发生了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失踪事。6月24日在左家塘苏洲公墓发现了高继青的尸体，这显然是被特务谋杀的。长沙市一片白色恐怖，学校当即宣布放假。这时食事会存粮也不多了，有的同学通过介绍去宁乡参加姜亚勋部队（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有的同学想回家，也有人劝我暂时离开学校。地下党团组织及时在学校发动了留校护校活动，派14班杨子希（市18中退休教师）从宁乡运来粮谷，清华中学同学也借一些粮谷支援我们，护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6月19日，龙汉河、钟振龙被营救出狱，同学们赶到排楼口码头迎接。湖大、一师等校同学在湖大操场开了一个简短又热烈的欢迎会，然后将龙、钟接回各自的学校。我们雇了一辆黄包车让钟振龙坐上，前呼后拥地紧跟着黄包车。从左家垅街口到一师传达室是个陡坡，钟振龙要下车，同学不让，便一股劲将车子推到教学大楼前，直把他送进宿舍。一路鞭炮，一路欢呼，人人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过了两天，白崇禧宣布解散学联，我便去湘潭了。

一师这段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详情我弄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同学中的地下党员有64班傅述衡（现湘潭市巡视员）、66班李叙升（现广西军区文化干校副校长）、朱协邦（解放后调中南局）、67班王伊端（后任湖北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和成云从（长沙市郊区离休）等；还有地下团和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组 （下转56页）

峥嵘岁月在清华

编者按：长沙清华高级中学是清华大学湘籍校友、教育家傅任敢、旷壁城、易仁荄利用抗日初期清华大学准备南迁时在长沙营建的校舍和其他校产，于1946年秋办起来的。校址在长沙西郊岳麓山乡左家垅。1952年，该校与省立一中合并为长沙市一中。清华中学一开办，就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长沙教育界，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下面，刊载该校部分校友撰写的一组史料，虽是些片断的回忆，但集中起来，可以看出在白色恐怖下，清华高级中学的师生们追求真理，英勇战斗的精神风貌。

难忘的启蒙教育

汤建武　罗昭绣　刘振海

清华中学，是一所多么值得留恋的好学校！从1946年秋她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投入了她的怀抱，在那里受到终生难忘的启蒙教育。是她，为我们开拓了智慧，灌注了力量，奠定了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清华中学继承清华大学的传统，讲科学，讲民主，形成了崭新的校风。学校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教师，如易仁荄、王鸿礼、施无已、杨英明，魏泽颖，刘云雅、宋扬等。其

中卞、魏、刘三位是地下党员。课堂教学抓得很紧，内容富有时代特点。学校不设“公民”课，语文也不用统一的课本。施老师教我们的语文，就以鲁迅作品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为主要教材；易老师教历史，广征博引，史料丰富；魏老师教生物主要讲进化论和自然辩证法；宋老师教音乐，则教唱讽刺、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歌曲，指导开展革命文艺活动。这使我们不但受到良好的科学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爱国主义思想，启发了革命意识。

学校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头两年是每周一次），曾邀请了孙立人、胡庶华、杨荣国、朱玖莹、舒模等各界的知名人士来校讲演，让我们接触到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和不同的政治、学术观点。同时学校鼓励同学多读课外书。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和国内出版的《时与文》、《观察》等进步杂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北方文丛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解放区生活和斗争的文艺作品，我们都如饥似渴地抢着借来阅读。后来，《中国向何处去》（即《新民主主义论》）、《人的阶级性》、《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党的文件，也在部份同学中秘密传阅。这些，使我们大大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提高了觉悟。

通过多种途径发扬民主精神，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也是清华中学的一大特点。从第一学期开始，学生自治会都由全体同学投票民主产生。每个同学可以自由“组阁”，发表演说，竞选自治会主席。一些与同学有关的问题，如穿什么样的校服，要不要蓄发等，学校领导都交我们讨论，各抒已见，再根据大多数的主张作出决定。当

时各中学都按规定照例举行“纪念周”，并要唱国民党党歌，念“总理遗嘱”，清华要不要这样做？如此“重大”问题，也交同学讨论。同学们都反对搞这一套，所以清华中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搞过“纪念周”，也不唱“三民主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学校支持同学们自由结社，社团多而且十分活跃。最先是施无已老师指导的，刘正、杨德庆、叶石健、李淮、朱尚同等5人组织的“疑问社”，不久尹岳中、唐纯彩、汤建武、邓庶康、李传礼、魏昌旺、杨筱芳等组织了“逆流社”。这两个社成立早，影响大。此外，李岳佑、汤文哲、张义、廖典惠、谢环丞、周辅仁等还秘密组织了“中国人民革命同盟会”。到1948年下期，社团活动和“生活小组”已普及到各个班级。各社团一般都办有壁报，全校办有校刊，评述时局，切磋学业，探讨问题。

1947年以后，长沙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每次游行示威，绝大部份同学都积极参加，受到革命锻炼；而学校领导往往“装聋作哑”，不予过问，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支持。到长沙解放前夕，地下团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发展到50多人，加上地下党员，差不多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清华中学对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讲自由民主，在学业上生活上则要求十分严格。当时学生全部寄宿，每天清晨有早操，晚自习要点名考勤，每人每周必写作文一篇，周记一篇，还要写一封家信向家长报告学习、生活情况。每门课有周考、月考和期中、期末考试。同学只许星期日请假进城，且必须周考及格、制服整齐、内务整洁才能批准，而且必须下午6点前返校；家住市区的同学，每月只能回家住宿一晚。记得第一学期由于开学较晚，但又要坚持办满20周，结

果我们都留在学校过春节。学校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作风，连一点细节也不放过。我们初入学时，都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傅任敢校长专门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叫大家排好队，一个个出入教室三次，做好随手关门的动作。这看来是小事，但42年后的今天，仍然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战斗的革命文艺活动

金 式

清华中学继承、发扬“五四”运动要科学、要民主的传统和“一二·九”运动的战斗精神，不但在学习上，即在文艺活动中也都显示了这种特点。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学里，音乐课程多半采用40年代的一些电影流行歌曲。也还有教唱《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等歌曲的，充斥着半殖民地的颓靡情调。清华一开办就不唱这些歌，特别是宋扬老师来我校教音乐后，对那些不健康的歌曲予以坚决的抵制和摒弃。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文艺活动在我校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宋扬老师配合各个时期的革命群众运动，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古怪歌》、《从前有个王老头》、《民国的怪事情》等歌曲，编写、导演了《金元券与袁大头》等活报剧。这些反映现实斗争的歌和剧，首先在清华同学中唱演，很快传到全市各校。

我校的文艺活动，在宋扬老师的指导下，调动了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参加者十分踊跃，三级同学邓彪、彭泽琦、杨振维、曾国雄等还专门成立了“宋扬合唱团”。每到傍晚，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同时节目的来源也很广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校差不多人人会唱的费克的名曲《茶馆小调》，就是李俭安用快邮从重庆清华中学索来的，他还向大家介绍了四川茶馆的风貌和方言特色，使此曲唱来具有四川人的俏皮幽默感，增强了讽刺效果。施无已老师给我们讲解解放区的革命文艺，介绍了重庆、昆明等地的进步文艺活动，并且辅导我们排演了解放区的秧歌舞剧《兄妹开荒》。记得当时没有女演员，杨德庆便主动扮演妹妹，他扎上个花头巾，很象戏曲里的男旦角，演来颇饶风趣。同学们热心学习民间舞蹈，还排演了《土风舞》、《农作舞》、《螃蟹舞》、《布谷声声》等节目。我们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并邀请邻校的同学和附近的农民参加。

强烈的战斗性与广泛的社会性，是清华文艺活动的突出特点。1947年6月2日全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清华中学带头唱起《我们需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滚你妈的，U·S·A》，突出了这次反内战、争民主的主题。以后每次游行示威，清华的队伍总是歌声嘹亮，斗志昂扬。1948年冬，为声援东北流亡学生，我们赶编了两个活报剧和一些歌舞节目，举行专场演出，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当场掀起了捐献热潮。在文艺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排演袁俊（张骏祥）的话剧《万世师表》。该剧通过对林桐教授不受威胁利诱，保持高风亮节的歌颂，唤醒人民提高警惕，坚定信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开始找不到演出场所，多亏旷璧城老师出面，借到了省第四育幼院礼堂（在宝南街），并得到该院地下党员黎维新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使这个剧得以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诞辰那天如期演出。《万》

剧由宋杨执导，我担任助导和剧务，并饰演一喜剧性人物刘教官。参加演出的还有张运道、程诜谊、张成昀、叶运达等同学。连续公演两场，除了演给本校师生看以外，还招待了长沙市教育界人士，得到普遍好评。我们随即把演出情况函告梅贻琦校长，他复信表示极感欣慰。

慰问流亡学生 营救被捕代表

廖典惠

1948年11月间，一大批东北和豫鲁流亡学生来到湖南郴州、衡山、安化各地。他们绝大多数是受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被裹胁而来的。隐藏在这些学生中的少数反共份子和国民党特务，假借流亡学生的名义散布谣言，对共产党、解放区进行恶毒攻击。为了揭穿他们的阴谋，市学联发起了慰援流亡学生的活动，我们在校内组织了募捐演出晚会。杨德庆、金式、谢作孚、周特新、陈诜谊等排演了活报剧《一个秋天的黄昏》、《是谁之过》等节目，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迫害学生的罪行。记得其中有个对口唱节目，一人扮演山东留亡学生，一人扮演长沙同学，用《黄河大合唱》中的曲调，谱填新的内容，演员一边唱一边热泪双流，台下群情沸腾。朱尚同、张式慈等同学立即站起来讲话，号召大家捐献。同学们有的当场脱下棉衣、毛衣，有的献出现金和其他物品，顿时形成了热潮。

在全市广大学生开展慰援活动的基础上，以湖南大学学生为首组织了慰援流亡学生代表团。第一批代表去湘南慰问

归来不久，又组织了湖大、省立一师、一中、一职、清华、妙高峰、周南、福湘等8校的代表团，由湖大派代表5人，清华、一师、妙高峰3校各派代表3人，带了同学们捐献的钱物及慰问信，前往安化县蓝田镇。清华的代表是朱尚同、廖典惠、谢环丞。出发前，宋扬老师找了我们到他房间里谈话，交代我们如何开展活动。代表团11月22日下午到达蓝田，第二天上午参加他们早已布置好的“欢迎”大会。会上，他们有人致词，大肆诬蔑共产党，说“共匪”在解放区如何迫害学生，逼得学生流亡等等。我们感到无比愤慨。一位代表朗读了慰问信，信中对流亡学生的痛苦遭遇表示同情，同时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阴谋。我们又演唱了《山那边哟好地方》、《你是灯塔》等歌曲。这时，山东烟台联校一分校校长赵兰庭气急败坏，命令全体学生撕毁代表团分发的慰问信和歌页，又指挥一些打手呼喊反动口号，围攻代表团。代表们被送到镇公所审讯，但是代表们个个沉着镇静，理直气壮，他们也无可奈何。清华代表油印了一些进步歌曲发给流亡学生，某股长讯问我们时竟说是“共匪罪证”。原来这些歌曲是我校一位同学刻印的，他在末尾刻印了“Y·S.C刻印”几个字，这些英文字母本是他的姓名三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而那位股长硬说C是“中华”，S是“苏维埃”，Y是“青年”，合起来是“中华苏维埃青年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代表们被关押在镇公所、自卫中队和荣华园三处，我们几个中学代表在荣华园客栈。这里看守较松，一位同学从厕所下面逃出立即拍电报告知湖大自治会。住在附近杨家滩的谢环丞的姐姐来看望我们，也拍了电报。还有3个代表趁机

逃出，赶回长沙报信。

11月26日，清华的同学正吃午饭，湖大三院学生、原清华一级同学刘正突然来到食堂，跳上饭桌大声说："慰问山东流亡学生代表团的代表们在蓝田被捕。现在湖大同学已经出发去请愿，清华的同学谁愿去就跟我走！"同学们听罢立即丢下碗筷，赶到灵官渡与湖大同学会合，组成一支队伍。到达省政府后，几经周折，程潜主席终于出面接见，接受了大家的要求，派秘书长刘岳厚和声援代表一道去蓝田，处理了此案。1949年1月4日，慰援代表团胜利回到长沙。

为民众服务　向民众学习

杨筱芳

由于进步思想的影响，学生运动的锻炼，清华中学许多同学都有走出课堂，为民众服务，向民众学习的要求，于是在1948年秋季，因陋就简，办起了民众学校（同时为本校工友办了工人夜校）。旷璧城、易仁荄两老师支持办民校，由学校行政拨给了校舍、课桌和少量经费。到1949年7月底长沙解放前夕，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有学生40多人，第二期增加到70多人，都是附近贫苦劳动人民的子弟。学生完全免费读书，并由学校发给课本，对特别困难的学生还发给笔墨纸张。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设6个班，每天下午上3节课，课程有语文、算术、常识、音乐。除算术采用通用教材外，语文、常识课文有好多是任课教员自己选编的，音乐则全是教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每到下午，清华一楼西头的民校课

堂，就传出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嘹亮的歌声。

担任民校教员的同学，都把办学当作直接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好机会，工作十分认真。第一期校长唐纯彩，第二期校长杨筱芳。两个学期都是刘硕良当教务主任，他一心扑在平民教育上，做的实际工作最多。教员由校长在进步同学中聘请，发给聘任书，先后应聘任教的有30多人，大部分是地下团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也有地下党员。他们全是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教学，除讲课、批改作业外，有的还自己编课文，刻腊纸，印好发给学生；有的还主动上门为个别缺课学生补课，学生和家长都很感动。

民校也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联系当地人民群众的桥梁。1949年4月和7月，配合学生运动，地下党支部通过民校，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农村访问。我们把全体民校教员（并由他们邀一些同学）编成若干小组，分片逐家进行访问。在访问中，向农民讲解形势，宣传政策，消除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疑虑；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农民的苦难生活，听到了一些老农讲的大革命时期打土豪斗恶霸的故事，使我们这些未经世面的青年学生深受教育。访问回来，大家汇报座谈，交流心得，讨论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步骤。在访问的基础上，我们又邀学生家长来校开了恳亲会，和他们建立了感情。办民校时间虽不长，但对当地革命活动起了重要作用，附近农民在解放前夕都和我们联防护校，维持社会治安。解放后，民校教员喻擎梧、曾国雄和四级同学李修能参加了郊区土改工作队；民校学生也大都成了土地改革和当地各项工作的积极分子。

黎明前的游艺访问队

李俭安　胡彦章

1949年初夏，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发展，长沙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政府企图各校停课遣散，以免学生聚集"闹事"。有些学生家长也准备接子女回家。根据这一形势，地下党指示，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团结广大同学留校护产迎解放。当时清华中学是"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争取真和平联合会"执委会5个副主席之一，负责全市各校的联络工作。我们剪辑了长沙市进步报刊报道各地学生运动的资料，组成壁报到各中学张贴；同时，我们20多名爱好文艺活动的同学，与邻近的湖大三院的同学组成游艺访问队，到河东各校巡回演出。我们每次分散出发，约定时间在演出地点集合；一场演出结束，又收拾起行装，化整为零奔赴新的演出地点。

我们的节目都是短小精悍、适合广场演出的，如对唱、合唱、舞蹈、活报剧等。宋扬老师给了我们许多具体指导。由他编剧和导演的活报剧《金元券与袁大头》，是演出节目中给人印象最深、效果最好的。这个剧上场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饰"金元券"，一个饰"袁大头"(即银元)，不需舞台，也不需伴奏。"金元券"是一个丑八怪的女人，头戴一个由许多"0"组成的花圈，身穿的花旗袍也全是大大小小的"0"，表示1万元、10万元一张的大额金元券不过是一张废纸。这个角色曾先后由杨振维、张成均等扮演。"袁大头"的化装比较简单，穿一身黄呢子军服，剃个大光头，由金式扮演。其他人则无需化装，只在一旁伴唱，有什么情况便保护这两个演员撤走。全剧演出共约一小时，全用花鼓戏曲调谱唱。最后是个大合唱《金元券哀歌》："金元券，命真苦，我出生不到一年，就垮了台，就完了蛋……肥了老板，瘦了百姓，如今害得我满手血腥……"对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膏肥饱私囊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个剧经我们演出后，很快传到其他学校排演，后来还移植到别的剧种。

这次访问演出活动效果很好，为了扩大影响，清华和湖大三院又与邻近的第一师范、岳麓中学联合，成立了麓西四校游艺访问队，继续开展活动。两次组队，都由李俭安担任队长，宋扬老师具体指导，清华中学起了主要作用。四校游艺访问队比前次的访问队规模大得多，内容更充实，活动范围也更广，几乎跑遍了市内各个中学。在访问演出中，我们利用演出前后，与其它学校同学们谈心，互相学习节目，介绍进步书刊，气氛十分融洽。两次游艺访问活动，对于团结广大师生护校迎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为市学联当联络员

刘甲柱

1949年4月，天快亮，更黑暗，长沙学联（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争取真和平联合会）活动频繁。为了协调和统一各校的行动，护校保产迎解放，学联分工由清华中学负责联络工作。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上联络员的。

我当联络员是同班同学张泽湘（地下党员）“动员”的。他很坦率的告诉我，说我是当联络员的“料子”：一是学业成绩还不错，平时不大过问政治，不引人注目；二是身体好，善跑路（因清华中学离城远，到各校联系全靠步行）；三是一直在长沙读书，熟悉大街小巷；四是有个可靠的后台，即我舅父彭锷，当时在长沙任71军军长，并与保安司令关系密切，我即使被国民党特务抓了，也不会怎么样。与我同时当联络员的同班好友陆懋增、薛恢奇，高年级的谢环丞、廖典惠等，条件都同我相当（如薛的舅父就是李默庵将军）。我们班上当联络员的还有谈寿夫、刘建球，但他们体质差一些，没有我跑得多，有时就留在校内为我们当“后勤”，为我们留饭菜，到洗衣店接送衣服等。

我们是分区进行联络工作的。我先负责南区各中学的联络，因为我在南区长郡中学读的初中，对那一带较熟悉；后来认为我能跑长路，又分配我去跑北区各校。

每次送传单和通知，都由张泽湘或朱尚同（地下党员）告诉我到哪个学校找什么人，我就直接去会他。有个学校在南郊雨花亭，路程很远，又相当偏僻，路也难走。有一次，我接到任务即从左家垅出发，由牌楼口坐划子过河，跑到天黑才回校“覆命”。联络的方式也简单灵活。清华中学的校服，原本是戴船形帽，为了便于联络，我便改戴学生“制帽”。这种学生帽里面四周是细篾织的高约5厘米的夹层软垫，有什么文件或纸条就可以藏在这里，到了联络的学校，找到接头的人，双方装作熟人模样，把帽子取下来，略谈一会，便交换帽子。这样，通知便递给他了。有时也不需用纸条，而用最简明的语言传达。如原计划4月24日举行省会各

界10万人大游行，后来因为白崇禧来到长沙，准备血腥镇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地下党湖南省工委决定停止游行，改为罢课3天。得知这一决定，已近黄昏，时间十分紧迫。我们联络员连夜过湘江，找到各校负责人，只讲“学联决定，游行取消，改罢课3天”，对方心领神会，联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起初，联络员每日都得回校碰头，后来改在市内碰头，碰头地点临时确定。我舅父在落星田有一栋公馆，我就在他的书房里和谢环丞碰过两次头。这在当时是难以被人猜疑的，因为我舅父公馆前有武装警卫，谁也不会想到在一个现役中将军长的家里，竟会有“小叛逆”活动。

联防护校迎解放

蔡诲文

1949年6～7月间，解放大军逼近长沙，白崇禧部队和地方团队散驻在河西一带。为了严防敌人狗急跳墙，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下党号召我们护校保产，迎接解放。我当时在清华二级读书，是学生自治会的治安股长，也是地下团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同班同学朱尚同传达了地下党支部的指示，要我担任纠察队长，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

我们学校右邻湖大三院，左邻一师，离湖大校本部也不太远。当时我校师生员工只有200来人，如不与邻近学校和当地群众联合，势难达到护校的目的，因此联防护校成为我们地下斗争的重大任务。

我校仅有一支驳壳枪和50发子弹，纠察队成立后，我们

把这支枪接收过来，又赶制了一批梭标，并从一师借来军训用的教练步枪，由一个当过兵的校工担任教员，进行射击操练。这时，一师进步力量日益加强，湖大三院一些湘西的同学有自备武器，我们相邻三校唇齿相依，互成犄角之势。而左家垅的居民为了达到保家的目的，也要依靠我们，就这样，奠定了联防的坚实基础。

我们三校和附近居民代表举行了会议，明确划分职责，确定讯号。我和一些同学从麓山寺抬来一座大钟，安放在学校屋顶上，钟声洪亮，响彻四方。一师、湖大三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左家垅一带农村则规定以锣声为号，一处打锣，四方响应。在左家垅到湖大校本部的途中也设了联络点。记得我们曾举行过一次演习，一声令下，钟声、锣声响彻云霄，各校纠察队员立即分头执行任务，许多农民扛着扁担锄头到预定地点集合，湖大校本部也派纠察队赶来声援。这次演习，既是联防力量的检阅，也是对敌人的一次示威。

左家垅一带有不少农民和贫苦居民，他们的子弟是清华民众学校的学生，和我们关系很好。我们一方面做好当地一些头面人物的工作，化阻力为助力，而主要工作还是放在访贫问苦，发动基本群众上面。民校里一些年纪稍大的学生是联防的可靠力量，并形成了一个情报网，只要左家垅附近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就接二连三传来情报，我们便采取措施紧急防范。有一天，左家垅出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民校学生发觉后纷纷报信（上级曾指示会有敌人破坏，要提高警惕），一些地下党员便及时撤离学校了。长沙解放不久，有一个敌军谍报员来到左家垅某居民家里，被民校学生识破。我们一面要他们热情款待，一面立即赶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报

告，终于将其抓获。由于建立联防，左家垅一带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

（以上资料系杨筱芳组织整理）

以上作者简介：

汤建武　长沙市化学工业局干部
罗昭绣　国务院工业普查办公室干部
刘振海　长沙县税务局干部
金　式　湖南省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廖典惠　长沙大学干部
杨筱芳　长沙晚报社编辑
李俭安　湖南农学院副教授
胡彦章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干部
刘甲柱　湖南省交通厅交通志编委会副编审
蔡诲文　湘阴县离休干部

策划兴华中学学生运动的回顾

曾敬诚*

革命浪潮冲击校园　校长一反常态

私立兴华初级中学创办于抗日战争时期，原址湘西泸溪县浦市镇。校长赵石虹是国民党中央嫡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的亲戚。曾任李的秘书。日军大举侵华时。赵石虹离开军队回到后方办起这所学校，由李玉堂挂名校董事长。1945年8月光复后，该校迁来长沙西郊岳麓山二里半细塘坡（今湖南师范大学境内北侧），通常办有六个班，三百多学生，专职教员较少，多数教员是附近学校任职又应聘来校兼课的。

细塘坡是第18集团军的公墓山，山上墓碑林立，还有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牌坊。校长的办公室、住宅都在墓庐屋里。李玉堂的巨幅照片，长期悬挂在大厅内。一幢两层的木楼为教室。另租赁郭姓旧屋作员工和男生宿舍，又租赁陈姓旧屋东头为女生宿舍，西头为小卖部，取名可可商店。

岳麓山是长沙市的文化区。当时有湖南最高学府湖南大学（以下简称湖大），有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和清华、云麓、岳麓中学。这些学校分布在湘江西岸一线，南起左家垅，北至溁湾市，兴华中学位于其间，又距离湖南大

* 曾敬诚系长沙市郊区生资公司离休干部。

学最近，在长沙市的学生运动中。深受影响。一同卷入了革命的浪潮。

我是当年湖大学生，与兴华中学教导员郑东生（麻阳县教委离休干部）、事务员郑芳和（麻阳县基层供销社干部）二人是小同乡，平时过从甚密。他们常带一些同学来我住处（湖大第五学生宿舍）打听学运消息，我热情陪同他们参观校区各种墙报、标语，传达有关信息，还特意找了几本湖大同学自编的《大家唱歌集》（油印本）送给他们。此后，渴望自由解放的革命歌声在兴华中学越唱越响亮，细塘坡打破了平日“严谨”、“肃穆”沉寂的空气。

校长赵石虹，苏北人，五十来岁，自称身体不适，长常养病，从不主持校务。自从校园流行革命歌曲后，他一反期态，不再说有病了。经常身着军装，走串校舍，窥伺学生动静。他下令在教学楼前刷写“我们为教育而办学，我们为求知而读书”的横幅标语，要求教员白天上课和晚上辅导自习时严格清点人数，控制学生外出。他还在师生中散布言论，说什么“初中学生年纪轻，不要象大学生那样只闹学潮，不上课。”

清算伙食帐目入手　搜出枪弹一批

1948年12月，我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转到法学院支部，支委胡光裕（重庆市交通学院离休干部）对我说：“兴华中学的学生还象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起来，主要原因是校长的压力太大，学生思想、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你和该校师生关系密切，了解情况，比较便于开展工作。要帮助他们解脱出来，尽快成立学生自治会，加入市学联……”

我与兴华中学师生一直接触频繁，平日在其谈话中，知道该校校长赵石虹的老婆邓海星（湘乡人）独揽总务大权，为人尖刻，克扣学生伙食，人们斥之为"猴婆"。接受任务后，我便与郑东生、郑芳和商议，提出从清理学生伙食费入手，以激起学生因吃不饱、吃不好而积怨已久的公愤，他二人表态十分明确、坚定，说敢干并能干好。于是，以郑东生为主，郑芳和协助，分途发动，先挑选几个学生成立膳食委员会，紧接着清查伙食帐目，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全校员工的支持。

在查帐过程中，发现收支都是邓海星一人经手，没有明细帐表，只交出一些零星记录。清帐无依据，工作无法进行，引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一天晚上，郑东生领着膳食委员会几个同学去找赵石虹，向他提出问题，要求答复。赵在学生开始提出清算伙食帐时，即已施展对策，把原聘的两名兼课教员（湖大经济系学生冯在三和机械系学生刘靖康）辞退了。这次，他见到学生上门来找麻烦了，火冒三丈，以斥责的口吻说．"郑东生，你是我一手栽培的。你忘恩负义，我要开除你！"顿时，一场混乱，30多个同学怒冲冲地闯进赵石虹住宅，吼道："郑东生有什么错误，凭什么要开除他？！""我们的伙食钱到哪里去了？这笔帐非算清楚不可！"……就在这混乱中，赵从侧门溜跑了。接着有人传来讯息，邓海星从总务室提出一口皮箱把钱带走了。学生们在极其气愤的情势下搜查了他们的房间。在一间楼房内搜出了一批武器，当即把它全部转移到郑东生的宿舍保存。第二天我到现场清点了数目，计有汉阳造步枪14支，每支枪都附有子弹带。还有木柄与铁壳手榴弹各数枚。这批枪弹，在1949

年2月湖大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时，胡光裕（应变委员会委员）在某夜指派颜杰贡（湖大地下工人支部书记，现在岳阳石油化工厂工作）带去几个校工，将它全部取走交给湖大应变委员会警卫队了。

成立学生自治组织　参加学联活动

赵石虹夫妇逃离学校后，曾发现有人几次潜来学校运走了一些行李、家具；其他兼课教员也不来校了，学校一度停课。这期的期末考试也未能进行，学生无事可作，经常渡江进城逛街；有的怕学校不开饭，准备回家度假去……。在这混乱的情况下，我和郑东生研究决定，由郑芳和出面去找邓海星，追回学生伙食费，维持学校开餐。不几天，郑芳和终于将这笔伙食费悉数追回了，学校秩序恢复，立即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有教职员工参加的学生自治会（后改为应变委员会），由李建国（学生代表）担任主席，郑东生、刘寿其（历史教员）等七人为委员。

1949年4月，兴华中学派代表参加了在湖大召开的长沙市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大会。此后，李建国多次找学联主席团联系工作，在上级统一布署下，曾组织全校同学为抗议反动政府、争取真和平，罢课三天；同年6月，郑东生又带领同学去省政府，为营救被特务分子抓走的两位学联代表（湖大龙汉河、一师钟振龙）参加谈判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国民党特务分子绑架活埋克强学院自治会主席高继青，兴华中学全校同学都参加了在湖大举行的追悼大会，合唱挽歌，共呼口号，抗议刽子手屠杀学生的暴行。

兴华中学师生在学运中经风雨、见世面，追求真理，有

的参加了革命组织。如郑东生经中共地下湖大法学院支部研究，被吸收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党的外围组织）会员，与我单线联系，组织学运（郑解放后参加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即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1949年6月以后，国民党军队一度进驻兴华中学，加上散兵游勇频繁搔扰，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终至停办解散。建国后也未恢复。

（上接36页）织，在清华中学任教的魏泽颖（已故）、宋扬，负责领导一师和清华的学生运动。

以上回忆记述，很不全面，错漏之处，请知情者补充订正。

武杰杜寅阶

万天石*

1932年春，我在长沙市日日新闻社担任副社长兼采访主任。一天，我在黄泥街口仁济诊所刘丙炎医师处见到了郊区菜农杜寅阶。经过刘医师的详细介绍，方知杜寅阶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武术家，令人肃然起敬。可是杜寅阶害怕宣传，一再要求不要在报上宣扬他的事迹。我虽答应了他，但我仍将他的情况向好友向恺然（国术训练所秘书）透露了。又通过向恺然向上反映，引起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重视。何键几次想请他出山，可他始终没有答应。他确实是条硬汉。兹将我所见所闻有关他的事迹简介如下：

长辫奇功　痛惩恶霸

杜寅阶（1860—1946）出生于长沙城郊石子塘。家贫，靠种蔬菜谋生。他自幼即喜武术，9岁学会了巫家拳，12岁时又拜著名拳师黄其昌为师，习武当功，技更精进。他每天清晨练拳之前，用头上的长辫对着门前大树抽打，并用长辫缠住树干，拼命拉扯，直至痛极始止。数年之后，他的长辫厉害无比，能当武器使用了。

* 万天石系民革湖南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木材公司离休干部。

那时，南门城外有条护城河，河上架了三座木桥，分为上、中、下三桥。这三座木桥很宽，过往行人甚多，桥的两边摆摊设担，小贩云集，热闹非常。当地恶霸胡叫天，乘机敲诈，向摊贩勒收码头费。不付码头费者，拳打脚踢，将人赶跑。因他懂得拳脚功夫，无人敌得过他，故敢如此胡作非为。

1875年，杜寅阶刚满15岁。有一天，他挑了一担小菜到南门口出售，刚到中木桥上，即被恶霸胡叫天拦住，向他索取码头费。杜寅阶早就听说胡叫天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很想借机杀杀他的威风。今见胡叫天来找麻烦，正合心意，即将菜担放下，朝着胡叫天吼道："刚来乍到，就要收我的码头钱，没有！你敢怎的？"胡叫天见他年轻可欺，非常生气，答道："娃儿，没有钱交码头费，你就替我滚回去！"杜寅阶冷冷地笑道："没有咯样的王法，我偏要在此地卖菜，你敢把我怎样？！"胡叫天气得发抖，双手揪住杜寅阶的长辫子，想将杜的头部压了下去。杜寅阶喊了一声"好家伙！"话刚说完，拔腿便朝西湖码头河下飞奔。胡叫天双手握住辫子不敢松手。全身腾空而起，双脚无法落地，如放风筝一般。杜寅阶一口气跑到了西湖码头河边，将头部向前一点，只听卜通一声，胡叫天被摔到湘江河里去了。胡叫天几沉几浮，险被巨浪卷走。杜寅阶见胡不识水性，恐其淹死，即跃入河里将胡叫天背上岸来。他问胡叫天："你还收码头费吗？"胡叫天羞愧满面地答道："不……不再收啦！"杜追问："再收又当怎样？"胡叫天抱着双拳说："如若再收，听凭处置。"这样，杜寅阶才将胡叫天放走。从此，胡叫天不敢再收码头费了。

一根扁担　活捉溃兵

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农历九月初一，长沙光复，推翻了满清王朝，焦达峰被推举为第一任湖南省都督。当天上午，有十几个清兵溃逃到城郊抢劫，正好与杜寅阶碰面。杜寅阶手中仅有一根扁担，他用扁担飞舞，打飞了清兵手中所持的单刀，十几个溃兵全都被他活捉，捆送到新成立的都督府中收押法办。焦达峰见他武艺高强，立即召见，并想留他任职，担任随身卫士。可是杜寅阶不愿做官，婉言谢绝了。

1919年5月，湖南督军张敬尧被赶下台，他的溃兵四处抢劫，弄得民不安生。有一天，杜寅阶的家里闯进几个溃兵，企图抢劫。杜寅阶见他们手中持有长枪，不好对付，遂心生一计，笑呵呵地对溃兵说："你们肚中恐怕有些饥饿了吧？我弄饭给你们吃，快进堂屋坐吧！"几个溃兵都没吃早饭的，饥肠辘辘，听说弄饭吃，怎不高兴？！便卸下长枪，架在禾场当中，跟着杜寅阶走进堂屋坐下，等候开饭。

杜寅阶不动声色，悄悄将堂屋前门关上，从后门转到禾场，先将几支步枪收藏起来，然后手持一根楠木长棍，冲进堂屋，举棍便打。几个溃兵骤不及防，手中又无兵器，怎敌得过杜寅阶的旋风猛棍？！不到几分钟，几个溃兵全被杜寅阶打翻在地，个个高呼"饶命"不止。

杜寅阶将几个溃兵用绳索捆绑，连同几支步枪一并解送到新任督军谭延闿的衙门里去了。谭延闿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指派团长张其雄（醴陵人，后升旅长）接见，并赏光洋一百元。杜寅阶分文不收，扬长而去。

运用倒肘　战胜冠军

1932年夏，湖南省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唐徽典听我说杜寅阶的武艺高强，他不相信，坚决要我带他去会见杜寅阶。那时，正巧杜寅阶进城来了，住在东牌楼他儿子家里（杜的儿子是美国留学生，神学博士，当时任基督教会牧师）。我将唐徽典介绍给杜寅阶，并说明唐有求教之意。

杜寅阶当时72岁，身体单瘦，背部微驼，从表面看，不像是有功夫的人。他见唐徽典个子高大，笑着对他说："你是第一届全省武术冠军，身体又魁梧，谁打得你倒呵？！"唐徽典也笑着说："你是老前辈，请指点指点我的功夫嘛！"杜寅阶转身对我说："我有个要求：今日我和唐冠军试试手，不管情况怎样，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能做到这点，我就和唐冠军玩一下，否则，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见杜寅阶愿意和唐徽典交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回答道："保证不发新闻，也不对任何人说。"这样一来，杜寅阶只好和唐徽典交手了。当时在场观看的人，除我之外，还有杜的儿子和儿媳、孙子等。自然，气氛非常紧张，杜寅阶仍然面带笑容，站起身对唐徽典说："请吧！"双手合拢，打了一拱。

唐徽典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用手拱了一拱道："老前辈，领教了！"说毕，用巫家拳中的"快刀削竹"招式，朝杜寅阶头部劈去。杜寅阶身子一晃，随即用"烈马奋蹄"的招式，先施飞腿，接着便是一倒肘，只听得卜通一声，唐徽典满面羞红，颓然倒在地上了。

杜寅阶一个飞跃上前，将唐徽典扶起身来，并对唐说："对不起，恕我失手了！"唐徽典答道："老前辈功夫之深，令我敬佩！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杜寅阶拒绝收徒，答道："我是个快见上帝的人了（杜信奉基督教），怎能收徒呵！"唐徽典见他执意不肯，只得和我一同告辞出来。这件事，我除了告知向恺然一人外，再没有对其他人说过。

不图名利　拒当评判

1932年9月，湖南省第二届国术考试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何键要向恺然推荐评判委员，人数越多越好。当时，我对向恺然说："杜寅阶武艺高强，可以聘请他当评判委员。"向恺然果然对何键说了，何键马上就写了一张聘书，交我送给杜寅阶。

谁知杜寅阶拒不接收聘书，他对我说："我是个穷苦老百姓，功夫还未到家，怎能当评判委员呵！"他说了许多谦逊的话。分别时，他还要我向向恺然转致谢意，说他以后再去拜会。自此以后，我再次请他出山时，他已躲到外地，避不见面。

后据唐徽典告诉我，唐担任华容国术训练所副所长时，曾聘杜寅阶为武术总教官，也被杜婉言谢绝了。

先祖介祉公事略

周仁济*

先祖父介祉公（1865—1931），清朝末期壬寅科举人，署理广东四会县知县，四品衔补缺，后以直隶州用，是当时湖湘卓有声誉的骈文家和诗人。

一、家世清贫

祖父字笏森，号佛生，别号痴庵，湖南善化县人。远祖原籍宁乡企湖，后迁于善化县。民国初年，在长沙赐闲湖卜宅而居，晚年在河西张家冲筑土室十数楹归隐，门前清水一泓，周围小山映带，茂林修竹，桔园送青，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林之逸趣，为老年人休憩之佳境。我家八房人聚居一处（今长沙市西郊岳麓山乡观沙岭村），先祖就是拥有几十口人的封建家庭结构中的当然家长。

曾祖父家鼎公，字益吾，是一位饱学秀才、著名的塾师。但仕途偃蹇，家无储粮。曾祖母左氏，出身于官僚世家，知书识礼，勤俭持家。在子女中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影响。家鼎公育子8人、女1人。在这么多子女的家庭中，祖父为长子，比先叔祖介袧公大20岁。他作为长子兼长兄，在

* 周仁济系湖南第一师范副教授、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兼长沙市委主委。

孝顺父母、友于兄弟方面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在他少年时期便有很强的家庭意识，靠卖文与教书为生。他授徒里闬，争相延聘，著名文人章士钊先生即出其门下。当时有些儒生考秀才，要倩人代做一些文章，他靠这一门路，赢得了不少酬金，买米养家。他刻苦自励，发愤攻读，一心希望科场得意，光耀门楣。他20岁已是一个工于八股文和骈文的能手，即使连写几篇文章或几首应制诗，神思敏捷，挥笔立就。

祖父在少年时代获得长邑优贡龙艺林先生的教益最多。龙先生博学多识，工于诗文，少时做过铁匠，娴习武艺，可谓文武兼备。但怀才不遇，终老于塾师，与益吾公同为受人欢迎的良师。由于先祖资质颖异，艺林先生遂将女儿许配给他。祖母是一位熟读诗书、事翁姑以孝道、事夫婿以诚敬的善良妇女，对祖父的毕生事业有极大的帮助。艺林先生殁后，家道衰落，遗有孤子履端（字冠军，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任国民党少将，现居台湾），即我的舅祖，由我祖父抚养成人，以报师恩。

长沙癸卯举人、著名的古文家黄俊先生是祖父的密友和同窗，在他撰写的《周佛生先生六十寿序》中是这样写的：

“当是时，益吾先生家徒壁立，儿女多且幼，君为家子，年差长，能以文章博金钱，富室争延为塾师，获修脯，纾家困。”

“益吾先生方病痿痹，君驰驱负重，以一身力养数口之家，俾诸弟徐纾诵读成立，同时辈流，多称道之。”

这是对祖父少年时代身负家庭重任的真实写照。

二、海棠夺魁

祖父在清光绪乙未年（1895）进了学。这次考试中，县、府试均列第二，院试冠童子军（即道案首），与二叔祖介祺同游泮水。丙申年贡太学。

当时，主持文运的学台元和江标（字建霞），是江南的著名才子，以词章取士，擢拔真才。祖父所写骈文，工丽頑艳，天骨开张，为江先生激赏。在院试中，江标以《祝秋海棠文》《隔年先有探花心赋》《秦瓦赋》命题，介祉公在《祝秋海棠文》中是这样开头的：

“在昔罗隐游杭，践兰盟于水曲，杜陵居蜀，联锦句于山城。夸富贵之奇姿，玉环态度，标神仙之上品，飞燕丰神。是以红烛高烧，照残深夜，绿章上奏，乞护春阴……”

这篇骈文在江标眼中视为全场之首，连篇圈点，评语如珠。介祉公咏秋海棠夺魁，传为文坛佳话。

1944年，前辈曹孟其先生（原湖南孤儿院院长）曾为我的《寒衲集》作序时，赠七绝一首：“迷离春色系相思，记得含饴绕膝时。旧雨不来今雨好，海棠红到一枝枝。”其中的“海棠”即指当日科场旧事，而“红到一枝枝”则是前辈对我的鼓励，希望我继承祖泽，能有所成就。

三、西平设馆

祖父贡太学后，即一肩行李，远走汴梁。当时他舅父左辅先生任职河南西平县知县，要他到幕中司秘书之职，同时设馆教左公的儿子左宗濂先生读书。从丙申年（1896）到辛卯年（1901）在西平县滞居。他一面教表弟读书，以报左公

见者，非君之诚朴清慎，能若是乎？”确为真实的叙述。

六、山城文会

祖父出任广东四会县县令不久，罗肇嘉道易顺鼎（字哭庵，湖南汉寿人，为“龙阳才子”，以诗名传天下，与湖北樊增祥号为诗坛二杰）来县视察，留连半月之久。由于他俩同乡之雅，兼之樽酒论文，或谈论经史、或挥笔作书，或相互唱和，给小小的山城频添了无边春色。他俩仿元白遗事，唱酬频繁，后来由易顺鼎先生编了一本《四会集》行世。

四会县衙内有一个花园，园内幽静，花草树木繁茂，是供县令公余饮酒休憩之所。一次，他俩饮酒时，诗兴随至，易顺鼎先生出了上联：“二千石朱绂相承，邑小有名园，所幸常留乔木在”，祖父当时敏捷而得体地对了下来：“四十载绣衣初到，来迟负丛桂，也同无奈荔枝何。”联中的“朱绂”与“绣衣”切合各自的身份，而“无奈荔枝何”出自东坡典故，可谓雅人雅咏。

惜别之时，易顺鼎道尹用长诗相赠。在几百字的诗中，记述了四会县的地理特征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赞扬了祖父一行作吏的政绩和不带家眷，仅携一弟一仆赴任的廉介作风，也抒写了小园的秀丽景色。这个诗轴是用绢帛写成的，字迹遒劲潇洒，风骨嶙峋，它一直由我保留。未料到“文革”初期，竟被抄没。幸此诗尚能记诵，附录在此，籍存今昔：

《出巡四会赠俤生大令》　　清·易顺鼎

依山行半日，始入山中行。山口似桃源，

涧水何其清。岂惟山灵迓，县吏亦候迎。

万顷秋稼黄，万叠秋山青。一笑相劳苦，
百宝已秋成。入山复出山，山外平原平。
绥江水清绝，似带绕孤城。县吏吾乡人，
学道知政美。天风吹车盖，使我颜色喜。
相揖樱桠中，共活青山里。谁知楚人声，
已落粤涧水。与君俱远宦，故山几千里。
谁非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老病惟思归，
循良望吾子。一官冷如僧，道远难携家。
君非葛稚川，无意求丹砂。县斋颇幽绝，
瘦竹兼疏花。小亭出其间，支铫可煮茶。
芙蓉正舒艳，颜色凌朝霞。此非蛮夷种，
流落来天涯。相逢万里外，使我长叹嗟。
同是潇湘客，天涯意若何。蛮江秋色远，
山县夜寒多。喜见连云稼，犹留听雨荷。
羡君惟一事，有弟伴东坡。

七、理财"三不"

国体改革，民国肇兴，祖父翩然归里，于长沙东乡沈家老屋置薄田，又与介褐公共营工室于河西张家冲灵麓峰下。此时，他兄弟八人有五人相继逝世，他与其六弟鹿苹、七弟介褐聚居一处。诸房所遗老少数十口，子女辈均须抚养成人，或嗷嗷待哺，或教养就读，或游学远方。祖父与介褐公两人肩负着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重任，而介褐公宦游外地，在众多情况下，祖父是这个家庭结构中的脊梁。他不图个人享受，淡泊自甘，不谋长房私利，箧无储金，以自己的高额俸金，全部献出为全家后代造福。在这点上，他确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一

青睐；一面精研闱墨，作北闱应考的准备。祖父逝世时，宗濂先生情深意挚的挽词，曾有"记皋比谈经，髫发青灯书味永"的佳句，记下了祖父教读的真实情景。

祖父到西平县以前，由于文名籍甚，威毅伯左府有贵介子弟以重金聘他到府设馆，他毅然辞聘，就其舅父左辅先生的邀约。辞聘时还写了一首七律："才名渤海恰风流，京洛逢尘乐壮游。囷米记曾分哲舅，布衣依旧傲王侯。敢将聘币凭空璧，须识明珠不暗投。寄语翩翩贵介弟，黄衫年少愿依刘。"从这首辞聘诗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不慕荣利、甘于淡泊的高尚品德。

四、三生有幸

光绪壬寅年（1902），祖父到京都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与湖南郑家溉、谭延闿、陈继训等同科，时年37岁。介褐公当时17岁，亦游泮水。祖父试进士失利，又回到西平县幕中，直到1908年参加吏部拣选。当时，吏部选拔一批举人、进士到广东担任知县，由庆亲王面试。湖南入选者有"三生有幸"的佳话，即在这次拣选中，湖南的周佛生、张益生、梁睟生三人同被选中，拣发广东任知县。祖父赴任时，不携家眷，只带一弟一仆，徒步履任，一洗当时官吏乘舆马、许排场的陋习。

五、四会政绩

祖父任广东四会县正堂，短短几年中，把这一山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风淳朴，五谷丰登，居民乐业，与他的清廉从政有密切关系。这样，深得上峰倚畀，委以变卖肇庆四府

官田的重任，任务完成后以四品官补缺。临行时，人民奉万民伞与“明镜高悬”匾额，以表彰其治理有方的业绩。

他在四会县任内的治绩，其荦荦大者厥有三端：

一为清盗源。当时四会县多盗，他仿照明代戚继光遗法，定团练，凡五堡，每堡出32人，组成拥有1600人的地方治安队伍，推举正直的乡绅主持训练，授以兵法，按月巡阅，以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他还安抚盗首陈某做县衙捕役，使其心服从事。这时，威堡遭巨盗洗劫，财物损失巨万，大批无辜百姓被杀伤，赖得陈某之力，四处明查暗访，终于把盗帮大头目王瓜四擒获，斩首示众。盗风为之大戢。

二为禁烟赌。有一个叫何燊的人，浑名下碌木，外设商店，内藏烟窟，是四会县的巨蠹。祖父亲自参加侦察，取得确凿证据后，亲自带捕役将其擒获，荡其巢穴，为士民所称快。该县原赌博成风，女犯尤多，往往一掷产罄，等到家人追问，多羞愤自尽。祖父最恨赌局害人之深，又深悯这些无知者的愚蠢举动。因此，他对赌博悬禁甚严，在他任内，妇女参赌现象几乎绝迹。

三为安民生。他治理四会，采取如下安定民生的根本措施：一则是兴教育。督促四乡设立小学百余所，以改变当时“新政甫萌，风气尚塞”的弊端。二则是清积谷。举办自治研究所，以清理地方积谷，筹赈济，则率先捐廉以为地方绅士倡，得到当地士绅的积极响应。三则是增设警察。筹办时经费缺少，也是采取官办民助的办法。

当时，大官过境，他廉洁自持，从不阿谀取宠，传为仕林美谈。黄先生《寿序》中称赞道：“上官某巡视至境，设八簋奉之，酒间且相唱和，清代二百余年僚属长官雅俭所仅

个完人。黄俊先生《寿序》中不禁感慨地写道：“君一生艰苦，刻励自持，处家则一门孝友，居官则一代循良，世而长此赉丝，吾人亦复何望，犹欲存人道于几希，则君之懿行，为可贵已。”在祖父逝世时，介祹公挽辞中有这样的话：“一生心血苦持家，垂死未休，空剩桔洲偕隐宅”，可谓情真语挚。

祖父挂冠后，无心作吏，读书自娱。当时湖南主持财政者物色廉吏，理财需人，在各方邀请下，他出司税务，历充醴陵、湘潭、城陵矶、槃梨、省河厘金征收局局长，宁乡榷运分局正办，榷运总局秘书长，长岳两关监督署秘书长，代理关监督，岳州海关办事处处长等职。

当时担任省河厘金局长一职，为聚敛钱财的肥缺，得此职者，往往积资巨万，上峰亦赖以致富，而祖父布衣蔬食，奉公自守。当日报纸说祖父“不谈钱，不爱钱，不要钱”，确为公允之论。他逝世时，主湘政的何键、财政厅长张开琏亲来河西乡下致吊，赠“廉介可风”的匾额，这是对老人居官的评价。

八、寒窗课孙

祖父一生最大不幸是先父的客死德国。先父生于清光绪廿二年（1898），在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以优异成绩毕业。弱冠时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历充两湖造纸厂、德记炼厂、湖南纺织厂总工程师，并与英商创办光华电灯公司，是湖南最早的电气工业的开拓者。旋考取高等文官，分部旋用，不就职。谋科学救国之道，毅然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研究电气机械，以患胸膜炎于民国十二年（1923）没

于柏林，年仅廿五岁。祖父希望他克绍箕裘，竟成梦想。父亲遗下我母亲陈氏、姐姐慎伯和我，弱媳遗孤，全赖祖父母的抚养和爱护。我母亲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长期患精神抑郁症，赖祖父视之如子，得以愉快度日。对我姐弟更是费尽心血，督其成人。

我十岁时，他教我写诗，读《事类赋》、《唐诗三百首》等书。有一次，他出了一个《咏秋》的题目，我写了一首七绝："木叶萧萧下翠微，采樵人带夕阳归。忽然一阵西风起，两岸芦花作雪飞。"又有一次，欣赏一张骑牛图，要我题句。我写了一首五绝："骑牛还击筑，山水任遨游。耕罢云归岫，题诗月上楼。"他非常高兴，鼓励我作联语、写诗。当时，我确实不懂得做诗，不过是从古人作品中凑些词句罢了。然而，他老青年时代所写工丽绝伦的骈文和具有李商隐风格的诗篇，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传统诗词方面的基础是在我祖父耐心教育下得到的。

我读初中时，住通泰街慕莲里，赁室而居，祖父当时任长沙谷米稽查处处长，和我们住在一处。他公余回来，一灯荧然，每晚把我喊在旁边，手点乾隆御批《资治通鉴》，一次课三十页。祖父年逾耳顺，戴着老光眼镜，全神贯注，手批不倦，诵声琅琅，至今犹萦脑际。

祖父66岁时，值冬雪飘飞，到寿星街吊张益生孝廉（"三生有幸"中的一"生"，另一"生"亦已仙逝）之丧，在深夜踽踽独归时摔了一跤。进门时，我把他扶进来，他的皮袍已被湿泥沾满，神色大变，从此得了重病。回乡疗治数月，百药罔效，竟至不起，结束了"三生有幸"中的最后一"生"。去世后卜阴宅于岳麓山茶子山之阳。他身后留

下了《痴庵诗集》、《痴庵骈文录》、《痴庵制艺》手稿，均未付剞劂。这三本手稿亦在"文革"中被毁。

回忆治丧期间，同僚故旧赠挽联者达千余幅。兹附录所记诵之数联作结。

黄俊挽：

同执绋送风雨友丧，未能扶持伴归，一蹶病因增我咎；
三视疾竟缠绵卧榻，可恨卢医乏术，数行老泪哭君多。

曹典球（原湖南省文史馆馆长）挽：

嘉会集元和，同经饱看沧桑，羡有循声留岭表；
道心托关尹，何事无灵药石，不留高士守寒矶。

曹孟其挽：

唯不趋时觉富贵萧然，阛阓真儒趣；
若难为我问田园安在，恻恻故人心。

黄兆枚（湖南著名古文家、清癸卯进士、吏部主事，人称芥沧先生）挽：

女孙没已经年，痛无母双雏，伯祖饼梨何处觅；
同学今余几辈，可伤心一哭，旧时铅椠到头空。

〔附〕　　潇湘渔家词　　　　清·周介祉

有江上之闲人，似滋泉之老叟。小艇为家，短竿在手，身世羊裘，功名乌有。半篙半网，洞庭本世业之田。一笛一歌，楚泽是优游之地。不沽名而钓誉，属意惟鱼。门鼓楫以垂纶，盟心共水。想其稚子敲针，老妻打浆，下网呼翁，收筒有女。一船满载，宛奴婢之俱全。二水中分，喜村庄之洽比。若乃夕阳曝网，红映洲芦。细雨湿蓑，绿迷江柳。呼邻唱晚，唤开云梦之烟。有叟行沽，醉钓湘江之月。无边风景，蟹舍分多。不老春秋，鱼竿占尽。顾或谓钓徒泛宅，赏心苔上

之烟波。船子截竿，屈指海滨之岁月。凡兹渔侣，多属阮贤。惟彼家人，或皆仙眷。然而春风水绿，无人更访桃源。秋水葭苍，有客时燃楚竹。是盖生涯如此，良非意兴偶然。我本楚狂，家居湘曲。烟消日出，常闻欸乃之声。岁暮人闲，拟续清斯之句。其词白：

老历江湖岁月多，一竿一笠一烟蓑。羊裘不着无人识，闲坐船头看逝波。（渔翁）

妇随夫唱喜能歌，明月当船更补蓑。偕阮不愁无伴侣，赢他人唤打渔婆（渔婆）

生长湘滨近水居，雏年七八已知渔。鲥鲭鲤鲟分明辨，世业真能袭父余。（渔儿）

小家碧玉养渔舟，不解烟波不解愁。闲看鸳鸯描绣样，俯临江水学梳头。（渔女）

数椽茅屋结湘滨，门掩垂杨却避尘。夕照恍开新画本，荻芦一带水为邻。（屋）

班竹丛生楚水头，一竿长被老渔收。闲来好拂珊瑚树，羞为功名下钓钩。（竿）

身世生涯系一舟，浮家泛宅向清流。安闲不怕风波恶，拟向桃源续旧游。（船）

鼓鬣扬鬐何太痴，纷纷争向个中驰。世人漫作临渊羡，尘网高牵自不知。（网）

湘江无浪复无烟，好趁晴光一放船。网得鱼儿肥美甚，携来换酒不言钱。（晴）

前滩雨涨走肥鱼，戴笠披蓑带雨渔。幼女收筒妻打浆，忙忙疑是采芙渠。（雨）

一声欸乃数峰青，早汲清湘趁晓星。下网莫惊红日出，

恐令鳞族伏潜冥（晓）

月暗移舟向蓼汀，水边阮阮一灯青。火光倒映沉江底，方讶天空夜有星。（夜）

一篙春水绿无边，打网人来镜里天。前渡桃花随浪戲，方疑误放武陵船。（春）

日落江干暑气收，渔歌唱彻白沙洲。芦中吹出迎风笛，水围清凉不羡鸥。（夏）

半江红树夕阳边，正是鲈鱼上网天。晚出洞庭歌互答，满将明月载归船。（秋）

楚江雪满正寒天，有叟持竿钓水边。笑说梨花先酿熟，安排佐酒度新年。（冬）

回忆父亲对我的书法教育

周昭怡 *

我的父亲介祹公（1886—1951），字筠翘，号朴庵，湖南长沙人，是近代湖南著名书法大家之一。我长期亲承训诲，不仅道德教育受到有益熏陶，而且在书法师承上受到莫大的教益。

回忆二十年代，南北军阀混战，父亲常寓居于广州、上海、汉口。我在周南女校初小读书时，父亲从上海回来，带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法帖，同堂兄弟姐妹各发一本，命子弟学书。从此，我开始学习颜真卿书法，每天课后回家，放下书包就研墨习字，临写麻姑坛。父亲教我先从基本功练起，练好独体字横竖画笔法，临写一张大字（字大3寸见方，每张写16个字）。父亲寓居武汉时，他要求我使用明信片与他通信。明信片是任人看的，字迹必须端正整洁，文理也要通顺。我总是规规矩矩的用小楷写明信片。高小五年级时，我家搬迁河西（今岳麓山乡观沙村），我随昭懿姐就读周南寄宿。遵照父亲的教导，下午课后，首先临习大楷，从不间断。这样持之以恒，我的基本功是坚实的。暑假回家，父亲也回乡歇暑，要求子女每日除学校功课外，要读古文、写大字、作短文。每天下午气温稍凉，便集兄弟姐妹讲文章，批

* 周昭怡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湖南省妇联常委。

习作。虽然这样的时间不多，却训练我们自觉地把写字成为了优良的习惯。

父亲对传统书法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我在书法上的造诣有极大帮助。他精研颜真卿楷书，兼工汉隶八分，在书法上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结合的。"颜公变法出新意"。颜公变法创新的精神，即是他的书法一变晋人飘逸之风，而成刚劲端凝之态。父亲学颜书，经过长期实践，有如下经验：

一、贵在用笔：父亲体会颜真卿笔法十二意，以篆隶笔意入行楷，笔笔力求平正，而后险绝。横竖点划撇捺，每下笔时，必须逆入而运笔，又须涩行紧收。形成中锋，垂直纸面。何谓逆笔？如写一横划，起势时欲右先左，笔锋向左推，绞过来，稍按即提，向右运行则万毫齐出与纸面平行。即用逆笔，还须涩行紧收。涩行是慢慢运行笔笔送到。紧收是收笔处不可拖沓。父亲在批改作业时，圈点示范，耳提面训。他说颜鲁公书刚健端凝，其法在用篆隶两笔意。先雄劲而后秀韻。骨力既成，形势自得。

二、讲求形势，计白当黑：学习书法，首先重在用笔，而后取形势。但在临摩和读帖的过程中可以双管齐下，又要有侧重。学笔法时，自然要学字体的结构。父亲的楷书不仅吸取颜书的端庄和钱南园的矩范，以及欧阳询和褚遂良的谨严，特别是博采篆、隶、北碑的布白调匀，计白当黑的妍美的形势。从父亲遗墨中（给昭懿姐的四幅屏条）楷书变化创新，以颜筋之劲参黑女之平，以颜书之神写黑女之韻，为晚年之绝作。他的行书，笔法求横平竖正，形势取险绝。集各家之长则姿态婀娜，百花争艳。我从父亲教学和作品中看到他用笔的坚定和形势的变化，体会到楷书写得好，篆隶行草

因形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宗传统才能启新风。

三、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父亲对古贤名教，感受甚深。学颜真卿书，后世推崇颜鲁公"精忠贯日月，书法冠唐贤，"也学其道德文章，书风人品，立身处世，严以律己。他教导我们"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读颜真卿真争坐位稿、祭侄稿，瞻仰其高尚的爱国情操与奋笔疾书的气质。他信笔随挥，写出了动多姿态的名书巨帖，从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与品质。学古人书如其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退隐山居，有国军驻境，他勉励军人保家卫国。教育子女努力学习，爱惜羽毛，奋发上进。他和近代湖南书法家曾熙、汪贻书、谭延闿、谭泽闿、郑沅、郑家溉、刘嵩都极友好。对别人的艺术成就，十分尊重，珍藏墨宝。谭延闿赠联："古来贤达皆如此，君家兄弟不可当"。刘嵩赠篆联"一代贤人工写作，四时乐事寓禽鱼"。父亲勤耕砚田，鬻字维持生活，晚年孜孜不倦，是我今天从事书法研究的典范。

四、持之以恒，奋发前进：学习颜体书法，楷书用笔，要笔笔中锋，一笔不苟，很是艰辛。父亲要求勤学苦练，持之以恒。他说，有恒是学习成功的要诀。天天学，月月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三十年代，我在湖南大学读书，父亲在南京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我将楷书日课习作寄去请益，父亲复信勉励："人生有一艺之传，便不虚生，不宜妄自菲薄"。这一要求启迪我奋发前进。清代梁山舟九十多岁其作品才传。我既不敢高求，又不可妄自菲薄。四十年前，日日学书，从未间断，抗日战争，避寇湘南，流离道路，只要有机缘，又整笔砚。记得在道县江村上窑山避日寇，我冒险下山取出了宋拓张迁碑。我在桂东省立第七职业专科

（机械、建筑）学校教书，向陈宗汉校长借读三希堂法帖，遍阅一通，又摹临不间。我家有三希堂法帖，从魏晋至元明名家书法，全都收入（三希堂碑版现在北京北海园内）。

一瞬数十年，虽有志"教育英才图济世，书研颜法欲传人"，以不负严亲之勖勉，而时不我予，愧无所成。

1988年3月

存乎天者於我無與也窮通得喪吾聽之而已存乎我者於人無與也毀譽是非吾置之而已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

家國黃熟車林柑抛向均龍戴物之風李盈緒好特贈頌多時澤蓋江南起山泰山英鹿車斷吾曼夢隨天涯黃梅緩貽山磬視猶父與渙好以家論詩治世復論禅之陀門風海內傳之賸称兄粘畔點白頭吾分標縣絃使君設葯筆遇沖斗天乍當陽酒園春清我聞山風雪怨天涯 握手盡文人 録定庵詩 書付汍兒 甲申孟秋介浏

（周介祹先生手迹）

我所知道的周介祹先生

柏柱臣*

介祹先生出生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学识广博，尤专经史擅书法。曾参加辛亥革命、反袁、护法、北伐、抗日，历任省政府厅长、秘书长、军事顾问、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参事等职。为官清正，颇获时誉。抗战期间，因世风日下，政治腐败，先生未到花甲，即退居长沙河西老屋（今西郊岳麓山乡观沙岭村），从此不仕，过着俭朴生活。我初次拜识他，是在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后。当时，我在国民党73军77师任团长。我团于7月完竣岳麓山附近地区构筑工事后，奉命移驻谷山冲整训。这一带，农房窄狭，只有张家冲周家大屋较为宽敞，但是名望显赫的人家，能否驻军，使人感到踟躇。我只好入乡先问俗。群众异口同声："周老先生十分开明，是我们河西有名的善人！"我满怀崇敬的心情，登府拜访，向先生陈述来意。先生平易近人，慨然应允，立即指定正屋左侧一栋横屋和门房作为团部驻地。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和慷慨豪爽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教诲谆谆 大鼓士气

我们全体官兵对先生非常尊敬爱戴，都以师父之礼事

*柏柱臣历任国民党73军77师连、营、团、师各职，现年85岁。

之。我每于工余之暇，趋庭求教，他总是诲人不倦，谈笑风生。为加强部队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时我们请先生讲课，他以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和戚继光抗倭等生动史实激励官兵奋勇抗战。他说：“我们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一切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明大义、顾大局，艰苦奋斗，团结抗战。”他还勉励我们要发扬正气，不随流俗，真正做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俯仰无愧的革命军人。这些金石之言，深铭肺腑，至今不忘。

我军是湘系部队，大部分为湘籍。军长彭位仁、师长韩濬曾多次去拜见先生。他们感情融洽，遇事直言不讳、畅谈共同关心的抗战问题。有次，他们分析抗战形势，谈到长沙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建议先生全家迁往我军留守地——安化，以避战祸。先生感谢地说：“我同长沙市40万人民在一起，顽敌何所惧？且到那时再说吧。”他的豪言壮语和与众同忧的心情，深得官兵们敬佩。

是年冬，彭军长升调国防部监察局，先生致函道贺，并对全军官兵表示亲切慰问。信中充满乡亲之谊，勖勉我军官兵坚决抗战，奋勇杀敌，保卫家乡父母、兄弟、姊妹，为国立功。军部将此信印发全军，官兵们深受鞭策和鼓舞。

身在野而心有国

先生归桑梓后，薛岳、王东原等先后主湘，都曾敦请出山襄助政务，被先生一一婉辞。我曾问及未就任原因，先生说：“道不合不足与同谋。尸位而禄，不如归去。”当时，不少人议论：“周公有官不做，别人却求之不得。”当地刘子衡先生也曾对我说：“他（指先生）清廉正直，不愿做官，甘居林下。殊不知多一个好官，百姓少一分痛苦。独善其身，无补于世。令人可惜！”然而，先生身在野，心有国。兹就我所知道的略举数事记述如下：

一、进忠言，献良策。先生曾告诉我，长沙第二次会战后，他在致薛岳函中有这样一段话：“治标不如治本，酷刑不如严训（注：指长沙第一次、第二次会战后，处决丰悌、文重孚、徐焜、廖龄奇之事）。帅旗巍立，三军稳定。将军桴鼓，将士奋攻。长沙乃敌我必争之战略要镇，长官身系国家安危，必保长沙。只要长官部永远坐镇岳麓山头，亲自桴鼓，则长沙可保无虞。”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情况万分危急，长官部始终在岳麓山指挥作战，终于取得伟大胜利。

二、请改役政，严惩贪官。这年9月，我团接收贵州师管区送来的一批新兵，其中除几名是被抓来的外，都是适龄应征的农民，平均年龄22岁左右。他们应该是身强力壮的，可在征兵单位呆了两三个月，一个个变得面黄肌瘦，疲病不堪。先生见状，甚为怜惜，问其原因，得知征兵单位管理人员层层克扣军饷，贪污舞弊，打骂虐待新兵，气愤不已。他说：“征兵是抗战头等大事。兵役机关凡此种种，不利抗战，必须严惩。我不能知而不言。”他即上书薛岳，具实反映情况，请求改善役政，惩办贪污人员。这封信写就由我派专人径直送到长官部。

三、同情难民，呼吁救济。先生早年官居高位。弃职归来，两袖清风，笔耕为生。生活甚是艰苦，仍尽力救助穷苦百姓。一次，我随先生渡江进城。有不少老少难民流浪街头，哀声乞讨。先生见状不忍，立即倾囊将几块钱换散，悉数分给难民。围观者称赞，却少有人效法。先生归去，心绪

难安，喃喃自语：“这多饥寒交迫的难民如何得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回家后，他写信给省府民政厅，为救济难民，大声疾呼。

1943年4月，日军进犯滨湖，我团奉命开南华安作战。行前，先生挥毫写《求阙斋语录》四张和一副对联，书末记事，以赠我留念。我拜受珍藏，每见先生手迹，回思往事，虽将半个世纪，仍觉先生音容宛在。兹写俚言一首敬念：

四海翻腾寄此身，胸怀道义挽沉沦。

高风亮节前贤逊，墨宝文章当世珍。

林下常筹除寇策，心中时念难民贫，

一生俯仰心无愧，天下如公有几人。

1987年初冬写于冷水滩

先父罗庶丹生平

罗书慎*

先父罗焌，字庶丹（1874--1932），湖南长沙（原善化县）人。世居长沙西乡望城坡。1901年迁居排山白石山房，因自号排山，学者称排山先生。

父亲自幼聪敏好学。四、五岁即学章句，我祖父授《孝经》，祖母授《小学韵语》。六岁从塾师，十三就外傅，十七从业师张子云学于长沙省城。1902年壬寅乡试，得中举人。1903、1904年两次赴河南礼部应试，均未中。

1904年秋赴广东。尝客陈德耀太守、朱乔生观察、李直绳军门幕府，皆处宾师之位。时清廷遣人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夏，父亲受广东制军岑云阶命，偕刘卢士考察台湾政治，由台北周历台南，阅二月回粤。台湾已于中日甲午战（1894）后割让于日本。父亲赴台考察时，激于爱国之情，深为痛惜。后在《麓西杂志序》一文中言及此情，有“览故国之河山，羁泯泪堕”之句。

1905年停科举，兴学校。1907年，父亲佐其师夏用卿创办广东法政学堂，并从师受法律政治学，卒业后，在校主讲，编有《法学通论》、《刑法讲义》等书。在法政学堂任教前后六、七年，校中藏书颇多，于是博览群书，教学之余，从事写作。

* 罗书慎系武汉市退休教师。

1905年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宣传民主革命，领导民党为推翻清政府及建立民国而斗争。父亲在广州数年间，深信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在教学与写作的同时，与校中同志参加革命政治活动。1907年，同盟会浙江负责人女革命家秋瑾被捕牺牲。父亲激于悲愤，作《悲秋》诗八首以悼，自序云："《悲秋》用杜甫《秋兴八首》韵，悼秋瑾也。丁未七月，与朱执信大符同作。"

1910年10月，黄兴去香港，准备发动广州起义，于香港设立统筹部。1911年3月29日，民党袭击广东督署，遭清廷武装镇压，广州起义不幸失败，死难烈士72人，同葬广州东门外黄花冈。当时，父亲亲其境，与校中同志徐杨慰祖等奔走于枪弹横飞之中，几罹于难。后每过冈前，不觉百感交集，时港沪各埠有以此役演为新剧者，父亲见之，辄为流涕。后有诗纪其事曰："巷语街谈出稗官，偶闻国故辄心酸，千年碧血嗟多士，三月黄花感百端。"（诗及事实均见父亲《五十自述诗》及其自注中。下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广州革命同志皆挽我父留粤。1912年，民国初建，胡展堂任广东都督兼民政长。朱执信在粤任绥靖司令。父亲承命至琼州（今海南岛）办理琼崖绥靖民政事务，兼理琼崖军务。冬，承胡展堂命偕古（古湘芹）李（△△）诸君率师五营平定琼崖匪乱，父亲专司民政，曾派炮舰环琼岛巡视一周。后在《自述诗》中有云："经文纬武寻常事，漫说书生止素餐。"

1913年由琼返粤，在省署内长内务。时中山先生领导"二次革命"，发动反袁斗争。是年6月，胡展堂被袁解职，各省纷纷独立反袁。袁世凯嗾使龙济光率师攻粤，"二次革命"失败。袁军在粤搜捕民党。父亲与革命同志皆陆续赴香港，集议收复省城。香港总督因龙济光之请，有允将民党引渡之说。诸同志遂分投海外。父亲与徐杨君等变姓名，逃沪上。1914年秋经福建，次年返湘。1916年任湖南省议会秘书长。

黄兴、蔡锷于1916年相继逝世。父亲为文、为联祭悼，哀痛逾恒，文情并茂，烩炙人口。如挽黄兴联云："义军起南粤城中，公从巷战，我作壁观，遗恨说同胞，三月黄花泣风雨；国葬拟西湖堤畔①，左峙岳坟，右环于墓，伟人成鼎足，千秋碧血奠河山。"祭蔡锷文中有云："天惨惨兮云油油，妖氛积兮罹百忧，帝孽犹存兮烂羊头②，吁嗟黄公兮已千秋，复悲我公兮疾弗瘳。繄何人兮奠金瓯？我心恻兮念九州！"高度颂扬了黄、蔡二公的不朽业绩，充分反映出清末民初国势民心和彻底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国，振兴民族，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的正义呼声。

1918年张敬尧入湘，父亲乃辞秘书长职，出任商业、师范及福湘各校国文、历史教员。1920年夏，湘军由郴衡直下驱张，张潜师夜遁。谭组庵为省长，父亲仍任省议会秘书长兼长沙县署第一科长。1921年8月，古湘芹迭电促往粤助理政务。9月至粤，为主管全省实业。尝与古湘芹、廖仲恺、邓仲元、邹海滨等集会。1922年，陈炯明叛孙。父亲乃回湘，先后出任长沙师范及中学教员。1926年曾应友人之约赴武昌为人司书札，一年后回湘。寓省城司马里，乃潜心著书，从事石鼓文、钟鼎文研究，编写《金文隶古定》一书，

注 ①黄兴原拟葬西湖，后葬长沙岳麓山。

②烂羊头，指军阀。"烂羊头，吴内侯"见《后汉书·刘玄传》。

为考古学作出了贡献。

父亲为人耿介廉洁。在湘、粤从政一、二十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闻1915年自广东经福建回湘，经望城坡至排山白石山房时，肩舆过境，箱笼颇重，为匪盗所窥伺，以为皆金银财物。于是盗夥十数人各持竹木棒至排山抢劫。父亲及叔父均受重伤，血流被体。盗启箱笼，则皆为书籍，遍搜匣笥，并无金银。1921年为避匪患，遂移家省垣，赁屋而居。晚年病重，竟靠借贷以供医药。我亲侍在侧，是以知之。其清廉自守如此。

父亲自弱冠即从事著作。30岁以前，尝自题书室曰湘中琳琅山馆，所拟著书已具草者约三十余种。出游以后，此事遂废。是以旧稿多未终篇。父亲治学谨严，一如其人。20岁时，著《孝经郑注集解》，后见同邑皮鹿门《孝经郑注疏》较为简要，遂未写定。1929年出任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授先秦诸子学，编写《诸子学述》一书，征引详实，有所发明。遗著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父亲健谈而平易近人。居湘城时，所交游多为当时知名学者教授，如李肖聃、王啸苏、杨树达、刘寅先、谭戒甫诸先生。时则把酒论文，唱酬递简，故父亲所遗诗稿以和韵为多。其后，我读高中、大学，受业于刘、李、杨几位先生前后7年。我早年丧父，而能完成高中、大学学业者，皆我父亲好友之助，即此可见父亲与时贤交谊之深。

父亲在湖南大学教学时，认真负责，诲人不倦。1931年，因病由岳麓书院移居家中以便就医，而仍编书不辍。因恐有误教学，乃约学生来家（当时住长沙南门碧湘街），以卧室作课堂，带病讲授。我正读初中，父亲讲课，我则为之

递茶送水。曾记得该班学生不足10人，中有黄思善、曾宪楷、唐淑琴等。父亲与学生关系亲密无间，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时，常夜深还与学生谈诗论文，析疑解惑。1932年父亲逝世，有学生挽诗，追思不已。记得断句云："最是夜阑还侍坐，满窗松月映疏棂。"

父亲性拘谨，律己甚严。在广东时，同志戏以"圣人"呼之。其居家亦持身谨严。中年丧偶，终其身不续娶。我母亲逝世时，我不满三岁，弟在襁褓。我父亲教养之责殊未易易。童蒙时，父亲即授我《论语》、《孟子》、《诗经》，稍长即授我以《尔雅》、《说文》、《战国策》、《读史论略》等。每课必熟读背诵，甚至并注释连读背之。尔后我能读大学，习中国文学，实植基于父亲之教诲。我自幼习书法，父亲要求亦严。楷书初习钱南园字。继习黑女志，行书临《兰亭集序》（赵孟頫摹王羲之本）。父亲离家在外，我每半月必将按日所习之字邮寄父亲批阅。我父顾而乐之，来函嘉许，云："阅毕，为之更饮一杯。"因父亲最爱饮酒，以此为乐。平居无他嗜好，只以书酒自娱。阅读或写作时，常手抚一杯，无量，而不及醉。

在修身方面，父亲曾教我以汉崔瑗《座右铭》为立身行事之道，治家则以朱柏庐《治家格言》为训。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家居之日不多。晚年居家，我得以侍奉左右，每日为之整理书案，清扫居室。我或有不是处，父亲从不打骂、斥责，只婉言告诫而已。父亲实为我的严父而兼慈母。

我父病逝于碧湘街寓所，墓葬于长沙西郊黄花塘（今西湖渔场境内），事已过57年了。今谨就往昔所闻、所见、所

（下转91页）

大江东去悼忠魂

——黄芝冈逝世十八周年祭

黄曾甫*

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戏曲史专家黄芝冈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1971年6月12日逝世长沙。1979年9月15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为之举行追悼会。

黄芝冈原名黄衍仁，湖南省长沙县人，老家原住在长沙郊区洞井铺附近，后迁到市区储英源16号。功年与田汉同学，毕业长沙师范学校，他曾在郊区境内小学当过教员。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据《长沙市志通讯》1988年第三期马松玄所写《中共建党初期的长沙基层党组织》一文中，即提到1922年前党员名单有黄芝冈其人。1922年12月，黄芝冈24岁，在毛泽东等主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工作。1924年自修大学转入湘江学校，增设农村师范部，黄又在此工作。后1927年3月，湘江学校自动停办，在3月19日下午2时，湘江学校举办的同乐会上，黄芝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上均见船山学社陈列的史料。

黄芝冈在自修、湘江两校工作时，还在长郡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同时李维汉也在长郡担任公民教员。黄芝冈还兼任

* 黄曾甫系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长沙校友会理事长。

《湖南民报》副刊“短棍”栏的编辑，学生称他为“短棍老师”，后来他即以“短棍”为笔名，常撰写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小品短评，鞭挞旧制度，抨击旧礼教，讽刺时弊，笔锋犀利，名噪湘城。

根据1935年《湖南大公报二十周年纪念册》中黄性一所写《过去之湖南新闻事业》一文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湖南民报出版，极为共产党张目，是为长沙新闻界之彗星。”又据该纪念册中李缙甫、莳竹所写《本报廿周年湖南大事记》文中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二日，湖南民报为共产党主持，妄肆抨击，凶焰甚张，其中‘短棍’栏为尤甚。”从以上这两段反面历史材料来看，当时黄芝冈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是有贡献的。回忆大革命时，我在长沙青年中学念书，虽没有直接接受过黄芝冈老师的教诲，但每天读到短棍老师的文章，很受教育和启发。当年下黎家坡府学宫中，办了个孔道中学，是晚清遗老翰林彭清藜、进士任福黎等所主持。孔道学校颁示布告，禁止学生阅读《湖南民报》，指责黄芝冈为“士林叛逆”。但孔道有些学生，竟于学校训育处的公告木牌上，张贴短棍栏的文章，声讨孔家店，致使这些昏庸老朽的封建文人哭笑不得。由此可见，当时民报短棍文章，极为反动势力所忌惮，而为青年学生所拥戴，影响之深，鼓动之大，实为巨川奔流，雷霆万钧，而成为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

“马日”事变后，黄芝冈被迫离长远走，传说一度在上海被捕入狱，久不闻其下落。1944年逃难到重庆，偶从蒋寿世寓所，得见黄芝冈一面，烽火声中，均忙于生计，未暇多谈。建国后，1950年3月，我奉派赴京参加全国劳动局长会

议，在北京王府井文化部艺术管理局田汉寓所，不期相遇，方知黄芝冈仍致力于革命文艺工作。当时他还陪我去拜访过中央统战部龚饮冰、北京市统战部廖沫沙等同乡前辈。

1956年黄芝冈曾一度返长，寄居宝南街刘忠壮祠蒋寿世家中。我当时在搞社会救济福利工作很忙，没有去看望他。他听了蒋寿世、康德介绍，说我热爱戏曲，对湘剧掌故比较熟悉，带信给我，要我帮助收集有关湘剧史料，我就拉拉杂杂写了一些转交给他。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发行的《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刊有黄芝冈所写的《论长沙湘剧的流变》，对湘剧历史，阐述详实，给长沙湘剧留下了极为丰富宝贵的遗产。1957年夏，他听说我调长沙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又写信给我，有意约我在六十年代和他合作编写《湘剧发展史》。无如世事风云，运交华盖，廿年放逐，到老无成，实有负黄老之雅望。更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赍志以终。三中全会以后，湘剧老艺人王华运告诉我：1971年6月黄芝冈被遣送回籍，病逝于长市北正街一间小屋之中，终年虽有73岁，但易箦之时，竟无一友朋临其丧，情殊悲惨。所有书籍遗著，亦均散失无存。王老当时住在附近潮宗街，曾亲眼及之。

八十年代初，我偶于省博物馆大书章中，发现有黄芝冈日记残本，据说是有心人自废品站旧纸中收来。适文化部戏曲研究所有人来博物馆，查阅资料。共同翻阅，见日记中颇多戏曲理论研究的心得。戏研所同志（忘其姓名）建议有人将其摘录整理成篇，亦可弥补戏曲史一大损失。岁月如流，蹉跎衰病，忽忽又已近十年矣。今年初秋，偶然忆及，驰书征询戏曲研究所颜长珂同志意见，复言尚难落实。余与芝

冈同志论交在师友之间，今日他逝世已届十八周年，追念前情，抚其遗作，愧对故人，能不黯然。1979年北京举行追悼会时，余曾写有两首七绝，迟迟迄未示人。今录于后，结束此文，藉抒怀念。

当年"短棍"揭湘潮，　今日传芭誉自高。
死去知君犹怒目，　毛锥奋起涌胥涛。

× × ×

大江东去悼忠魂，　廿载蹉跎我负公。
一曲广陵成绝响，　寝门何处哭秋风。

（上接87页）

历，简述其生平，颇不全面，愿知我父的诸先达加以补充订正。

柳森严在长沙郊区

万天石

麓洞里寄居　教育坪出丑

1932年，柳森严刚刚由四川回到长沙，寄住在北郊麓洞里3号彭允彝家。彭允彝是一位绅士，曾在大总统府当过教育总长，写得一手好文章。柳森严邀约顾汝章比武的那封信，便是彭允彝替他写的，真是字字珠玑，令人百读不厌。

邀我到彭允彝家去会见柳森严的人即是湖南省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唐徽典。唐系长沙暮云市人，那时46岁，比柳森严大18个春秋。唐是柳的启蒙拳师，柳的巫家拳即是向唐学的。不过，他们两人私交很好，从来不以师徒相称，一向呼兄唤弟，亲密非常。

唐徽典邀我去见柳森严是有目的的，我是日日新闻社副社长兼采访主任，他想利用我替柳森严发新闻，为他吹牛造舆论，以便发泄他对何键“重北轻南”“的不满。

内幕是这样的：1931年9月底，唐徽典报名参加湖南省第一届国术考试，荣获冠军后，何键对唐并不重视。1932年春，湖南国术训练所成立，派万籁声为所长。唐徽典要求何键派他到国术训练所去工作，何键敷衍他，只送他一个名誉教官的空头官衔，而无实职。可是国术训练所所聘的教官，全系外省人，以北方人最多，湖南籍的教官几乎没有。唐徽典恼怒非常，认为何键“重北轻南”，太藐视湖南人了，非

得和他斗斗不可。由于何键是省主席，又是带兵的总司令，明斗是不行的，只有设法和他暗斗。如何暗斗呢？这就是柳森严和唐徽典两人研究出来的鬼点子：用柳森严的名义，邀约国术训练所总教官顾汝章公开比武。顾汝章是江苏武进人，出生在湖南以北，把他作为北方武术家的代表人物；柳森严则作为湖南的代表人物。意思是说，何键重用北方的武术家，我们湖南武术家心中不服，要和北方武术家见见高下。

柳森严的武术是敌不过顾汝章的，如果真要交手，柳森严会被顾汝章打得头破血流。这一点，不但唐徽典知道，就是柳森严本人也非常清楚。为什么他敢于公开邀约顾汝章比武呢？原因是何键早就发出过文件和布告，说提倡武术是为了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强种强国，只准参加公开的国术考试，不准私人比武，免结仇怨，造成流血事件。唐徽典和柳森严抓住了这一点，知道和顾汝章私人比武，何键是绝对不会批准的，因此心中有把握，敢于大胆发出邀约比武的信件，借此大造舆论，好对何键施以精神上的压力，迫使何键改变“重北轻南”思想。

我当时秉着“有闻必录”的原则，将柳森严约顾比武的信件和情况，写成稿件发往各报刊登。谁知新闻见报后，引起了大的轰动，全国各报都纷纷转载，柳森严竟成为当时全国的新闻人物，红极一时。

何键对“顾柳比武”事件，看得很明白，心中虽然极为不快，但他并未作出报复，仅在柳约顾的信上批示“不准私斗”四字。对柳的猖狂行为，置之不理。直到6月间万籁声辞职离湘，何键才自兼所长，委派向恺然为秘书负实际责任。同时派唐徽典为正式武术教官。从此，唐徽典再也不提

"重北轻南"的事儿了。1932年10月，何键又在教育会坪主办湖南省第二届国术考试。这次，他专门派遣副官李海秋前去催促柳森严报名应试，硬要亲眼看看柳森严当众出丑，他才甘心。

结果，柳森严在第二届国术考试会上果被技术教导大队的学生宁德生打翻在地，大出其丑。最后取录的名次为第16名。何键总算出了心头之气。

以上是柳森严寄居在北郊麓洞里时发生的事情。

回龙山被捕　马坡岭伏法

柳森严，别号文彬，小名柳三牛皮、神老光，长沙县长桥人，1905年出生。柳森严自幼顽劣成性，不务正业，只有小学文化。他在长沙市伍家井公益贫民艺徒学校读书，因屡次和同学打架，被学校开除。后进明德学校补习班，又因殴打女同学而被除名。1923年，他去广州当兵，北伐时当过副官、运输队长。1928至1931年，曾在四川刘湘部队当副官，年底返湘。由于邀约顾汝章比武，虽未比成，但却出了名，遂到处招摇撞骗。1937年，他在长沙市党部西街（今民主西街）开办森济医院，自任院长。是年12月，经韩中石、罗德钰的介绍，柳森严正式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槊梨市博益小学抓捕过进步教员易秀娟。

1945年，柳森严利用其特务身份，将长沙市贫儿院院长程士万赶跑，由他担任贫儿院院长。当时贫儿院设在北郊文昌阁，因该处房屋不好，乃将贫儿院搬到南郊回龙山（今回龙山小学）。他住在贫儿院的三楼上。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那儿会见过他（笔者与他系老相识）。

据该院厨师（后当传达）刘云熙说：柳先后奸污过四个女生。这四个受害者，都是爬围墙逃跑的，后来一直没有找到。长沙解放后，他仍然住在这个楼上。1951年1月某日晚上十点许，贫儿院前后左右全都被武装警察包围了。四个便衣刑警，敲开了传达室的房门，悄悄地告诉传达，是来抓柳森严的，要传达指路。首先由一个便衣刑警上楼去，其余三个刑警站在操坪等候。

这时柳森严正坐在书桌边，还未入睡。便衣刑警推门入室，对柳说："你就是柳院长吗？"柳立即站起身来，惊讶地问道："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便衣刑警回答道："我们公安局局长请你去一趟。"柳森严顿时紧张起来，边说边朝窗边走，"就得去吗？"柳问。便衣刑警防他从窗口逃跑，当即上前将他的手扶住，口中答道："是呵！是请你马上同我去！"迫使柳森严不得跟着他走。柳乖乖地被便衣刑警扶着下楼，刚走到操坪，其他三个便衣刑警围了上来，将柳夹在中间，同时出门朝北走去。走不多远（今市十一中分部门口处），所有放哨的武装警察全都包围上来，用枪对准柳，只听其中一人严厉地说道："柳森严，你已被捕了，要放值价些！"接着将柳的双手铐上，前呼后拥走出回龙山，到了铁路边才上汽车，随即将柳押入看守所。

在看守期间，因柳态度很不老实，又加上脚镣。柳被捕之后，检举信件纷纷投到公安局和长沙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一些铁证如山的事实，使得柳无法抵赖。

1951年11月20日，长沙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军法处将柳押赴长沙市东郊马坡岭刑场，执行枪决。当时发布的39号罪状云"判处主文：该犯在解放前充当特 （下转102页）

我在长沙郊区创业的情况

彭虞阶*口述

随着长沙城区的发展，我曾经设厂的地方，现在大多归属市区了。回想当年的情况，我是着眼于郊区建立厂址的。一方面，租金便宜，而且大有扩充的余地，另一方面，它邻近主要市场。享有地利之便。我从事工商业长达八十来年，其中不少兴替转折时期都与郊区有缘，爰记其有关事略于后：

初遭敌手

民国以还，传统的生活习惯逐步有所改变。我注意到吸烟一项也渐次以纸烟代替水烟，成为交际先锋。纸烟既卫生，又方便，吸者日众。加之中外纸烟厂多设在沿海一带，内地既有广阔市场，劳力资源又极丰富，取长补短，有其优势。遂于1927年在长沙市南门外碧湘街租赁厂房。并征得尧阶五哥同意，利用其所存留的全部资金，创设我省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中国华昌烟草公司，共有资本银圆二万余元。从上海购买大型卷烟机1台，配有磨刀机、切丝机、压筋机等设备。限于财力，抽筋与包装全用人力，是一个半机械，半手工的工厂。全厂职工200人，我任董事长，由五哥的长子瑞初担任经理。瑞初有一定的文化与管理知识，制定了较

*彭虞阶历任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代表，省、市民建、工商联委员、常务委员。

完善的规章制度，延聘了一位上海技师。烟叶取之于河南许昌，质量好，货源足。华昌公司生产的高档香烟叫做“曼丽”牌，后改为“美曼丽”牌，继又增加大众化的中档烟“岳麓”牌和“革命”牌。美曼丽牌有10支小包装与50支听装两种。革命牌则采用100支扁盒包装。日产5大箱，每箱5万支。

华昌公司的纸烟投入市场后销路甚好，引起英、日、美烟商的忌恨，对华昌公司发动了一场市场争夺战。它们将其产品“白金龙”、“哈德门”等贱价倾销，甚至买一包，送一包。在资金、设备、技术力量、包装美术等方面，我们明显处于弱势。加之当时政局混乱，军阀巧取豪夺，竟在烟厂主要原材料上加征复税，更使我们不敌对手。华昌公司苦撑3年，亏蚀殆尽，于1930年被迫歇业。这套赔本的设备，有谁来问津？只好运往长沙西乡望城坡方家巷子家中搁置起来。多年的辛勤积蓄，一旦付诸东流，国仇家恨，耿耿于心。

重振基业

1931年，我携带家小回到望城坡。虽在商场饮恨，却无意闲居，又筹集少量资金，在家中开设把粉作坊，用蚕豆磨成豆浆，引进河南技术，加工制成粉丝，扎成小把出售。豆渣用于养猪，猪粪用以肥田，进行综合利用。但因住屋附近没有自己的田土，饲养牲猪也不懂行，得利不大。把粉作坊虽只搞了两年多，然而，流传至今的把粉制作工艺，对提高湘粉质量水平，尚有一定影响。

在开设把粉作坊的同时，也撚制过三股精线，即用32支

单纱3根，通过手工机具撚制成线，但以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旋即停工。可是在抗战时期，这种加工工艺却得以应时而兴，成为一个时期的家庭新兴手工业。

1938年，我在五哥的协助下，借用他在望城坡莲花塘的住所开设针织品漂染作坊，略有盈余。当时抗战军兴、沿海工业产品来源阻隔，内地市场对木纱线需求迫切，我转而合伙开设裕民木纱线厂。产品畅销，经营日有起色。以后又得五哥鼎力支持，更名为福民线厂。累计经营所得，为恢复烟厂生产打下了基础。

1939年全面抗战已持续两年，外地纸烟来源中断，而长沙市场需求日殷，我便决定恢复烟厂。当时，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均有困难，我下定决心，依靠工厂故旧的力量，辗转于邵阳、长沙之间，经历两年多的筹备，直到1941年，华昌烟草公司与福民线厂在方家巷扩充厂址，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将生产车间分散，增加小型卷烟机2台，培训手工卷制技术，扩大手工制作工场，每两天的产量达到30大箱，用汽车运销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烟叶来源除广东南雄外，还来自云南昆明和贵州贵定。美曼丽牌和金丝牌香烟都受到大后方人民的欢迎。1943年改名为复兴烟厂，职工人数将近500人，从资金、产量、职工人数、业务范围、赋税数额来说，这个厂是战时长沙市民营工厂中比较具有规模的一家。

烟厂的复兴，得力于厂内同仁的团结一致。我曾鼓励职工以红利入股，并对有重大贡献者，采取赠送“人力”股的办法，使工厂的赢利与职工们劳动实绩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烟厂几经搬迁，在逃难途中，职工们仍能维系不散，且

抓住机会大展宏图。

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年是鼎盛时期，共拥有大型卷烟机6台，最高日产量30多大箱，累积资金折合黄金2000多两。1947年更名为联兴烟厂，选任五哥的第二个儿子瑞强担任经理，全厂职工800余人，是当时长沙市8大烟厂中最大的一家。与同行相比，联兴烟厂工资水平约高10%，年终职工红利按纯利润1/3提取，则高于同行20%以上，其他膳食供应都高于一般标准。

我们出身贫困家庭，深知民间疾苦。致富之后，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历来都有微薄贡献。早在1926年前后，就以五哥为主，每年春节期间，以一房（1/4担，约40市斤）、一担为单位，委托米店代兑为数不少的“年米”，以帮助贫苦市民与郊区困难农户。抗战胜利之后，随着经营情况的好转，这项支出有较大的增加。如在洪水泛滥季节，向沿河两侧灾民捐赠粮食，分发到户到人，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当时的《中央日报》对此也有所表彰。

创建纸厂

1944年我在重庆采购中原造纸厂生产的卷烟盘纸时，对造纸工业产生了兴趣，心想抗战胜利之后，在长沙创办造纸厂。经过参观重庆造纸工业学校实习工场，详细了解造纸机械和设备情况后，信心大增。1945年春，我引荐两个亲戚家的学生王振春、刘健敏去重庆造纸工业学校学习，并担负其在学习期间的全部费用，为筹办纸厂储备技术力量。同时联想到长沙的印刷工业也过于落后，彩印尤甚，全省竟无一台胶版彩印机。于是，我计划相继在长沙开办胶版印刷厂，作

为纸厂业务的延伸。两厂资金折合黄金800两。取名为天伦造纸厂与天伦印刷厂。

1946年冬，我用银圆9000多元买进牛头洲(现桔子洲头)地区土地1100多平方丈，作为天伦造纸厂的地基。1947年初破土兴建。向重庆订购了造纸机械设备。王振春担任厂长，并邀请了他的几位同班同学和我的长子瑞涛一道安装调试机器设备。计有"44×36"杨吉式造纸机（单缸单网）1台，120磅荷兰式打浆机3台，8英尺圆蒸煮球1台，其他如切料、动力、蒸汽、抽水、照明等设备都是就地添置的。原设想纸厂地处湘江之中，原材料、燃料、成品运输装卸方便，用水汲取于湘江，排水放之于下流，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建厂地方。可是实践证明，它污染河流，危及人民健康，为环保所不容，是一个在选址上的严重失误。因而造成后来被迫迁厂的严重损失。

天伦造纸厂基建安装工作历时载半，于1948年8月正式投产。湖南省第一家民营造纸厂在物价飞涨、百业凋敝声中诞生了。它生产白报纸、包装纸、胶版印刷纸，市场畅销，供不应求。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时，天伦造纸厂拥有职工200多人，日产厚薄纸张1--2吨。建国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派驻工作队进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我们学习时事政治，提高觉悟，促进生产。半辈子盼望的社会秩序好、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终于实现。我决心进一步扩充生产设备。1950年收购了与造纸厂仅一墙之隔的民营湘江水泥厂，接着又租了工厂附近一栋楼房，厂区面积扩大了一倍。人事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经理彭瑞涛，副经理王振春、彭瑞泉（兼任天伦印刷厂经理）。

1951年造纸机已有3台，其中单缸双网一台生产白版纸。单缸单网两台，一台生产包装纸，一台生产胶版纸。配备了与之相应的机具与设备，增加一台英造2吨蒸汽锅炉。职工有400多人，两年中翻了一番。原料除竹麻丝外，试用废纸、稻草、芦苇造纸均获成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还利用沉井的方法汲取江水，保证水源清洁，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这一年，我市高空过江电缆建成，正常输电，解决了生产用电问题，年产量达到1071吨。11月间，在市二商局工作组的领导与厂工会协助下，进行重估财产的评审工作，登记财产总值为人民币14万多元。资金虽有较大增长，但生产机械化程度偏低，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低，接受不了国内订货业务，深感要进一步发展生产，非提高机械化程度不可。但限于个人财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高级形式，申请公私合营。1951年12月天伦造纸厂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签订了公私合营协议，得到政府批准。至此，纸厂的生产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成为我省少数几个最早公私合营的工厂之一。

1952年，我光荣地上北京出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会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心情激动，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年冬，湖南省工业厅通知纸厂派员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造纸工业会议，彭瑞泉参加，旋即被推为中南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央轻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造纸工业会议。过去我从事工商业几十年，办过不少大小工厂，受到政府如此的重视，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联兴烟厂、天伦造纸厂以及后来创办的天伦印刷厂，长沙市工商界同仁习惯称之为“天伦三厂”。公私合营后，这些厂都得到巨大发展，已成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企业，就规模与效率而言，都完全超越我当时的想象。从小见大，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个人、企业灿烂的前程。

1987年12月

（长沙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办记录整理）

（上接95页） 务罪魁，称霸地方，捕杀爱国人士，奸淫勒索，众所痛恨。解放前夕，仍组织特务组织，坚与人民为敌。解放后又企图待机而动。兹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柳森严被处决时，年46岁。

据当时目击者说，柳森严被五花大绑，坐在刑车上。车到马坡岭，武警将柳推下车后立即开了三枪，当场便击毙。

望城坡罗积庆号

罗德钦* 口述

长沙市西郊望城坡老街，呈S形，全长约近一公里。从东到西过半处，有一高地，名曰卡方岭。以岭为界，岭西叫上坡，亦名大坡；岭东叫下坡，亦名小坡。面东立岭上，可以俯视省垣，望城坡因此而得名。

商店溯源与概貌

先祖辉祖公，曾在上坡开设“罗积庆”综合商店，经营油盐、南食、杂货，附属药室、槽坊。先祖有五子，先父赞廷公（1867—1937）居三，16岁即承祖业总管全店，至天命之年生我。我记事时，镇上的店铺屈指可数。卡方岭以西，只有我家与“积馨厚”（综合商店）和罗秋凡碓坊；岭东从下坡口数起，也只有“罗聚馨”（综合商店，堂叔所开）、黄萃升染坊、李宏兴肉铺、裕和隆烟铺、兴旺楼茶馆和杨家茶铺几家。

“罗积庆”座落于上坡口街北，铺面朝南。临街有六页大木板门，营业时全部敞开。进店门，厅的正中上方所挂“文魁”二字匾额，为堂叔庶丹公壬寅（1902年）乡试中举时皇朝所赐。由此可知，“罗积庆”早期经营的景象。我家原系五

* 罗德钦系望城坡居民。

代同堂，至于先辈是何时创业的，已无从查考。但，自我知事起，群众习惯地称上坡口为“罗积庆”，把商店地名化了，可见它悠久的历史。

全店土墙建筑，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正中为厅，厅左为铺房。曲尺形柜台，一线临街，一线把厅与铺房隔开。临街的那线柜台上安有六页小木板门，收市后，还可扣开小门购货，方便夜来顾客。厅左那线柜台靠后部位竖有虎头牌，牌上方挂有“罗积庆号”四个金字的招牌，牌下方有玻璃宝笼置柜台上。宝笼里和铺房货架上陈列着各种商品。厅右临街一连两间房居人并囤放货物。第三间是碓屋，自己加工食米。全店前部分有一层木板楼房，楼上可住宿。

铺房后面连着小间住房。厅后有院落。后部分有两进。第一进正中是堂屋，堂屋两侧正房居人。右正房紧挨厨房。第二进左边向外开3公尺为槽坊，内设备一应俱全，自制高粱酒上市。中部有猪舍，常年饲养牲猪。右边为仓屋，内有木板仓一口。全店铺面宽约17公尺，进深20公尺，前窄后宽，类似曲尺形。

“罗积庆”经营的商品除高粱酒与清油烛为自产外，其它均由城趸回。太平街老正大南货号、公大兴药材行和大西门河街利生油盐号，均属供货的老往来。

先父毕生诚实经营，经常教育家人及学徒，做买卖决不能贪图暴利，不顾招牌；要讲信誉，真正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才会招徕顾客。由于“罗积庆”的商风正派，生意日益兴隆，规模也相应地扩大。在民国初期，先满叔竹廷公率一班人马，于下坡开设分店，店名“五丰福”，同样经营油盐、南食、杂货，附属药室、槽坊。

精工制作清油烛

“罗积庆”的清油烛最负盛名，周围数十里群众莫不交口称誉。其特点是：烛貌精美，亮度大，耐燃，不流蜡泪。旧时无手电，夜行提灯笼。购得“罗积庆”三九方烛（约两寸多点长）一支，能行三十里，比别家生产的同规格清油烛要多行七、八里，这是众多顾客实验过的。

“罗积庆”的清油烛能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竹芯干，用料好；二是精工制作。所用竹芯，全系龙洞（今望城县境内莲花乡）杨新盛号定点供货。杨家老板为人信实，竹芯质量过得硬。他先年砍竹裁成坯料，次年按小香扦、少四付、中四付，老四付，三九方和每对重四、六、八、十两（旧制每斤十六两）的规格尺码定好型，再用灯草加丝棉将上油蜡的部位缠匀、缠紧，然后百支成捆送来，保证捆捆足数，无一次品。

先父加工清油烛，手艺高超，技术真传学徒。在操作时，善瞻火色，掌握油锅温度，按不同规格的标准下蜡，按一定工序进行制作，一句话，不偷工减料。因清油烛货真价实，尤为善男信女喜用，故平时畅销，逢年過节销量更大。每年为了春节应市，立冬即作准备。货柜里和铺房、前厅、堂屋诸室顶部竹架上，悬烛无数。春节应市后，不待元宵即已销售一空。

“罗积庆”与“罗半边”

先辈商运亨通，也迷信神明庇佑。每年除夕，摘取“罗积庆号”金字招牌供于神龛上，向它跪拜祈祷。元宵一过又

鸣鞭将招牌复挂原处。此半月，前门一页半开，应付一点零星生意。家人欢度节日后，各司其职，共展新图。

由于家庭人口激增，居处拥挤，先父经手在上坡购置了房屋两幢。1927年，全家共商同意，又凭族戚拈阄分析。分析后，父辈五房兄弟先后在上坡或下坡开设有“五丰福”、“庆丰福”综合商店和大成丰、西福记染坊。后先满叔竹庭公长子将“五丰福”迁往“罗积庆”原址，摘下“文魁”匾额，换上“五丰福”牌号。同一时期，同宗和不同宗的罗姓所开店铺如罗万盛香铺、罗太昌杂货店、罗裕丰碾米坊和“复兴长”（综合商店）等应运而起，连同原有的罗秋凡碓坊、“积馨厚”、“罗聚馨”两综合商店，罗姓经营的店铺已节节相连了。另外，还有一些同宗与不同宗的罗姓散居在此从事其它行业，时人便以其从商发达和子孙繁衍之意，有“望城坡‘罗半边’”的称颂。

（火原记录整理）

淞沪血战亲历记

王卓超 *

1937年8月13日，继芦沟桥的炮声，东战场展开了抗日战争史上最激烈悲壮的“淞沪大血战”。日寇“三天攻占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被彻底粉碎了。数万“武士道忠魂”寄泊异土，我们也付出了60个师的惨重代价。

大战初，我任国军36师108旅216团3营7连排长，尔后任第2营重机枪2连连长，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战役。

36师与87、88两师系当时国军中装备最佳的部队，隶属张治中将军主持的“南京军校高级教官室”（高教室是战前京沪警备司令部对外的保密称号）。部队原驻京沪地区，担任京沪间的守备，并秘密修筑该地区的国防工事。1936月12月，36师调陕西“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部队随顾祝同主任进驻西安。淞沪大战前夕，全师紧急动员，乘军列驰回上海参战。

火山爆发般的抗日怒火

“我们再不打内战了，去抗日！抗日！”这是我们师长宋希濂将军（黄埔军校一期，湖南湘乡人）在当时动员会上的

* 王卓超系民革长沙市郊区支部成员。

豪言壮语。全师官兵蓄积已久的抗日怒火，火山爆发般地震撼天地。我团1营1连排长、我的黄埔军校同期学友信云生，撕毁了回乡完婚的假条，退还好友的礼赠，誓言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完婚。我的上士排附殷承发，湖北武汉人，是个当时被人卑视的“老兵痞”。部队调陕准备打仗时，他借故住了医院，可是他得知部队去上海抗日，他赶了几日夜的火车追上部队，并要我给他多年不通讯的家里，写了封以身许国的绝命书。

军列经陕西华阴车站时，一位穿着袈裟的和尚急促地跑上火车，二话没说即还俗归队。他原是我营重机枪3连排长顾恒尊，我的辽宁省同乡、黄埔军校同期学友。由于不满现实，不愿打内战，部队调陕时，逃去华山潜入空门。为了抗日，为了打回老家去，他又毅然从空门走上战场。还有咬破手指写血书的，伤病未愈自觉归队的，蹩着怒火磨刀霍霍的……因年代已久，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部队经过南京时，我也给多年不通讯的家里写了遗书，交给当时我的同乡好友高语和（高当时在中央大学读书，以后任立法委员去台湾。）

我团约于8月15日左右抵达上海近郊的真茹车站，当夜即向市区开进。这时87、88两师和我师先期到达的106旅，已在市区杨树浦、日本海军公园等地与敌展开激战。隆隆的炮声和冲天的火光，激励着我们紧张求战的心情。我团进入市区后也已夜深，但未逃难的市民仍纷纷涌向街头，罄其所有，送来各种慰劳食物，并主动地给我们带路、报敌情，搬运行李、弹药。一向被人视为“好人不当兵”的“野人”（上海人私下里对当兵的卑称），深深地被人民群众的崇敬感动

着，士气更加高昂。我的排附殷承发近乎歇斯底里地向全排吼着：在火线上谁要孬种就不是人养的。

唱着战歌的冲锋

8月20日，我团奉命攻占黄浦江边日军固守的汇山码头，意图切断日敌的水上交通，进而围攻日租界。

汇山码头的敌阵地，纵深约半公里。通向码头只有一条笔直的大街。在码头前300米处有一横向大道与此街交叉，敌人在两路交叉的路中间，筑有钢板掩盖的沙包工事。沿横向大道靠码头一侧的房子里，更筑有永久性的工事。他们控制了制高点，在阵地前设置了障碍，组成严密的火网。当时我们敌情不明，地形不熟，部队又从未打过街市战，攻击路只有一条街，部队散不开，轻重炮兵又不能进行有效的掩护，时间紧迫也不容许我们穿房打洞，只有凭着勇气与热血冲锋陷阵。

我团先以第1营任主攻。战斗开始，部队沿大街两侧利用墙角、屋檐、电杆掩护前进，尔后，官兵竟不顾一切地跑在街中，密集地冲向敌阵地。冲上一排倒下一排，倒下一排又冲上一排。战斗一个多小时，攻击不奏效，而第1营却伤亡过半。我那战友信云生（黄埔军校10期1总队步2队学员，山东省惠民县人），首先倒在敌人沙包前，尸体也无法拖下来。

午夜，我第3营接替第1营的任务继续攻击。我们依然步着第1营的血迹，各连轮番地猛冲。战斗不久，7连连长郭炎（黄埔军校5期，湖南人）、8连连长刘元仲（黄埔军校7期，湖北人）、9连连长徐××（黄埔军校7期，湖南

人）先后负伤，全营也伤亡过半，攻击也无进展。这时，我们团团长胡家骥（黄埔军校5期，湖南湘乡人，后任刘安琪部军长，去海外）扛着军用斧头来到第一线，他看见我这个幸存的大排长，要我把全营的士兵组成敢死队，再向敌作最后的冲击。当我组成两个敢死排后，那位还俗的重机枪连排长顾恒尊，他放弃在楼上较为安全的掩护任务，主动向团长请战，带一个敢死排冲在最前面。

冲锋号响了，我们团长首先唱起"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的战歌，敢死队的官兵有的唱着战歌，有的喊着杀声，勇敢地向敌阵冲去。

这时，日本鬼子也被吓懵了，在工事里哇拉哇拉乱叫，动用了所有的火力阻击我们，并打出了燃烧弹，烧燃了大街两旁的房屋。我们在毫无掩护的火海中，蜂拥冲击，顾恒尊排长光荣地"园寂"在汇山码头日敌的阵地前。我目睹他在死前的瞬间，还挣扎着向敌阵地爬去。壮哉！我的黄埔军校同期同总队步3队的好学友！

我带着敢死队第2排冲到距敌沙包工事约30码处的横街上，再也无法前进了。望着近在咫尺的敌阵地就是拿不下来，官兵们感到无限的愧恨和愤怒。这时，我的排附殷承发突然把水壶中的酒大口喝光，说了声："排长，看我的！"拿着手榴弹即向敌沙包工事冲去。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倒在敌人沙包工事的枪口前。这个"老兵痞"，就这样壮烈地殉国了！

天快亮了，部队奉命转移，我们团长胡家骥在督战时也负了伤。我们的营长顾心恒（黄埔军校6期，江苏人，顾祝同的弟弟）以愧未完成任务坚不肯撤退，曾举枪自戕，幸左右及时拦阻，才拖下战场。

我们没有攻下汇山码头，但我们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打出了"中国不会亡"的举世赞誉。

喋血苏州河

8月下旬中，日寇增援部队开始在川沙口登陆，为保市区作战部队的侧翼安全，36师调守江湾镇。接着，敌大批增援部队陷吴淞、宝山，在大场之线与我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江湾战事此时较为平稳。部队补充调整后，我任第二营重机枪2连连长。

10月下旬，我大场之线终于不守，日寇一部主力直逼苏州河，36师的两个旅又先后调任苏州河守卫。我营守卫苏州河东岸陈家桥至李家滨之线。

11月初，日寇开始强渡苏州河。他们每次进攻，都是按立体化的正规战法，倾其优势的火力，先以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并以数百门各式火炮（其中包括6吋的海军炮）进行大面积射击。接着放起弥天的烟雾，然后以几十辆水陆坦克掩护扛着舟桥的步兵前进。我们的阵地成了火海，我们的工事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来不及修了，就以牺牲的战友的尸体作掩体，官兵视死如归，与敌展开壮烈地拼搏。用手榴弹炸坦克的；潜伏在河里炸敌舟桥的；抱着敌人滚下河里撕杀的比比皆是，战斗兵打光了，勤杂兵补上去，营里的兵打光了，又从后方增援部队中拨补一个加强连。这个连长姓名番号还没来得及问就上去了，就倒下了。这样我们坚持了四昼夜，血水染红了苏州河。

到11月7日，日寇陆续渡过苏州河，我营仅存的几十个

官兵，在代连长范超毅（黄埔军校10期2总队，辽宁人）和负伤未退的新任营长陈衍寿（黄埔军校6期，福建人）指挥下，仍是每屋必守，寸土必争。我们伤愈归队的团长胡家骥也来到营部督战。黄昏前我负了伤，在危急中被上海同济大学的战地救护团把我送到上海南市枫林桥中山医院。

这个只有几百病床的医院，由于战局恶化，伤员无法向后方转移，挤满了数千人。走廊上，院子里，到处都是呻吟疼叫之声。11月9日淞沪全线总撤退，10日日寇侵入南市，他们兽性大发，除几百轻伤员闯过铁丝网进入租界外，其他全死于日寇的刺刀下，并遭到纵火焚尸。

我于9日转入法租界的宝龙医院，幸免于难。一个月后，乘红十字会包租的意大利客轮"恩德"号逃出"孤岛"，经敌占区吴淞口至浙江宁波，又回到抗战的行列。

写于1988年春

一代学者鲁实先

鲁传先 *

先父鲁实先（1913—1977），宁乡县人，谱名佑昌，以字行，晚年号瀞庐。祖父渭平公，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积资升至少将旅长，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荣立战功。祖父治军治家严谨，有儒将风度。祖母周氏，出身农家，稍识文字。祖父母十分重视父亲幼年学习，礼聘塾师来家教授。因父亲天资聪颖，学习专注，每遇疑难，穷根究底，塾师教学棘手，不久辞去。他从小自学。9岁时所作文章，乡间宿儒为之叹赏不绝。他12岁即能批阅《荀子》。15岁入长沙明德中学，因有感于学校课程浅杂濡缓，质疑问难，又不能解悟，常出言不逊，与老师顶撞。校方遂对此"桀骜不驯"的学生予以辞退。祖父闻悉，认为有失门第体面，震怒不已，责他回乡看牛。幸得祖母资助，购回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给他自学。

八年寒窗苦学 《驳议》震惊士林

父亲17岁开始系统地自学，仅费时一年又八月，潜心读完了二十四史。他特别爱读《史记》，认为它上贯群经，下开诸史，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故以其为研究学问的中心。

* 鲁传先系长沙市郊区黎托中学副校长、民进郊区支部成员。

乡间书籍匮乏，父亲为研究好《史记》，婚后十天即远赴祖父任职所在地的杭州读书。三年工夫，将文澜阁旧藏四库全书的重要部分研读完结，又去北平图书馆攻读，间或旁听硕师讲论。他在北平专力求学，四年中仅观赏两次京剧，后他又在开封、洛阳等地浏览公私藏书殆尽。

父亲在北平图书馆平均每日读书十本，读书速度实在惊人！他认为，读史书观其大略，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必能"识货"了。他在阅读中，发现问题，穷源竟委，并勤作笔记。偶有心得，用纸条记下，粘贴书页上。如此日积月累，撰写成文，扩展成书，经过八年苦学，他终于获得丰硕成果。

1937年春，父亲年方24岁，即写成《〈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下简称《驳议》）一文，见赏于国学大师杨树达先生。《史记会注考证》系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积20年之力，广罗古籍资料而撰成。该书内容极为丰富，彼邦自诩为空前之作。父亲阅罢则认为该书舛误甚多，列举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七个方面事实，撰文进行驳斥。1940年，他又将《驳议》扩充为15万字的专著，书中引证有关《史记》书刊1600多种，由长沙湘芬书店印行。该书由杨树达先生作序，序中云："……君（注：指著书人）之立说，乍视若至可惊，有如云中天马，破空而来，不可逼视；及其广征博引，枝叶扶疏，又如钱扩江潮，万头俱至……"喻《驳议》对《史记会注考证》的批驳"如秋风槁叶，分归陨落。"对父亲在历法考核上的成就认为是"超越前儒，古今独步者"。该书问世，有识之士竞相争购，皆叹服著作者学问之精审广博。泷川龟太郎也致函深表感佩，称我父为秀才。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

先生闻讯，兴奋异常，立即填《满江红》一首相赠。其词曰："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洹水遗龟河洛文，流沙坠简《春秋》笔，看缉熙日日迈乾嘉，前无匹。泷川注，夸劳绩。服鸟赋，难分析。赖发蒙千载，庚辰元历。衡岳精灵撑突兀，潇湘风韵恣扬激。料方壶定感一声雷，震遐逖。"《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中，还盛赞父亲"在研究《史记》方面显露出来的杰出才华，不让日本学者妄自矜夸，为中华民族争来了荣誉。"

"伯乐"破格提拔　昵称"娃娃教授"

1942年，杨树达先生介绍父亲去复旦大学（当时该校因抗战已由上海迁重庆北碚）任讲师。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现年92岁，仍住校）看了父亲著作并通过与他论学，认为父亲的奇才足任教授而无逊色。陈先生有感于当时系内有些老教授，或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或抱残守缺无所发现，远不及父亲的学识和才能，于是建议校长聘父亲为教授。此建议提出后，议论纷纷。因父亲学历与资历浅薄，系内任教者竟无一人支持此举。陈先生深感人才难得，又为激起大家的竞争心，毅然力排众议，不顾得罪同事们，坚持己见。后经教授会通过父亲著作，校长最后决定：聘为教授。但有些老教授仍不服气，暗中去听父亲讲课，终于为他的博闻强记、高深学问所倾倒，甘让充宗夺席。

父亲被聘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年仅29岁。人们昵称他为"娃娃教授"，一时传为美谈。

三年惨淡经营　大振家乡教育

1946年暑假，父亲辞去复旦大学教授工作，返归故里，即被宁乡靳水流域四乡联立的靳江中学校董会聘请为该校校长。与此同时，南昌中正大学亦寄来教授聘书、旅费，并专电催促启程。在这两者之间，父亲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决计接任校长。

该校原管理不善，教学松驰。父亲上任伊始，即从提高教学质量、改善生活环境、整顿学校风纪诸方面进行大刀阔斧地工作。他多方罗致，建立了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聘请进步教师张名鼐担任教导主任和学有所长的杨伦杞、李青山、杨毓华、蒋洪畴、陈理扬等担任各科教师。中共地下党宗一特支密谋，将宗一中学校长汤菊中（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推荐为靳江中学校董会驻会董事，还派陶敏（女、又名蒲生）、龙仲、田莲俊、傅超群等党员潜入学校任课。父亲非党非派，不涉及政治，只要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都热诚欢迎。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和检查自习，到饭厅、寝室巡视，在校会上发表生动的演讲，激励学生发奋学习。

在改善生活环境方面，他聘请花匠培花育树，美化校园。在树木茂密的后山修建跑道，以利寄宿学生晨跑。当时乡村无电，不能安电铃，而学校范围大，打点难以听到。父亲设计安排，在教学大楼前搭起一个高高的能遮阳避雨的木架，上悬一口募捐来的铜钟，一根长绳系着能摆动的钟砣，只要一扯动，钟声宏亮，方圆数里都能听到。他为解决饮水困难，选取附近一口较洁净的池圹，因陋就简，在圹中竖起一个高大的木架，上装滑轮，用两头吊桶汲水注入木架上的

大木桶内，再用打通了竹节的竿子连接着，引流厨房，节省了供水的劳力。他还雇人种菜，养猪、做豆腐、香干，每逢周末“打牙祭”，改善了师生员工的生活。他四处奔走，为学校募捐，购置了大量的图书、仪器，新建了好几个篮、排球场。还利用手摇发电，安装了收音机。

在整顿学校风纪方面，他赏罚分明，言必有信。为紧急刹住校风日下的趋势，他上任后，赫然在布告栏内贴出上署校长室的明令三条：一、侮辱师长者，开除学籍；二、考试舞弊者，开除学籍；三、破坏公共财物者，开除学籍。以上三条严格的要求，对那些不务学习，顽劣不羁的纨绔子弟来说，确是收到了震慑的效果。

学校经过以上几方面的改进，面貌焕然一新。学生读书兴致日高，成绩日上，校风日好。父亲曾得意地对来参观者说：“我的学生在教室上课鸦雀无声，在餐厅用饭鸦雀无声，就寝以后鸦雀无声，而在操场上却是龙腾虎跃，欢声四起。”

满堂珠玉春风　忘我教书育人

1950年春，父亲离家去香港，旋转赴台湾，先后在台中农学院、东海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及其国文研究所任教授。他授课前一刻钟已座无虚席，窗外走廊上站满了外班、外校的同学和外国留学生。他不收听课证，不点名，不发讲义，采取“姜太公钓鱼”方式。讲课时，上则杂引经史，下则参以小说、掌故，莫不左右逢源，妙趣横生。即使讲授一般认为枯燥乏味的文字学，他都能深入浅出，巧设比喻，绘声绘色，精义迭出而引人入胜。在引用前人疏证之处，每能指出书名、篇名乃至某句，无一字无出处。学生依此笔记详查原

书，十九无误，喻为“听课一节，读书满车”。

父亲为传授文字学，一连几年利用周末增开“特别班”，不收钟点费，学生不算学分。课堂内外，生徒密坐环立，多达数百人。有远在百里外赶来的，虽狂风暴雨亦不能阻挡。其讲学之盛，台湾人士认为数十年来未有逾此者。

父亲严以律己，上课从不迟到、早退，数十年如一日。他身体消瘦，但精神矍铄。讲课时声音洪亮，感情充沛，全神贯注，经常从口袋中抽出一支香烟而忘了点燃，直至下课仍然手指夹着那根“长寿烟”。

父亲平时不好交游，绝少应酬。去台后更以校为家，视学生为子女。在他寓所里，接待着一个又一个的门生，不厌其烦地为其释疑解惑，有时还供给食宿。

爱书、读书、藏书　一生操觚不懈

父亲在大陆时生活简朴。吃的粗茶淡饭，穿的布衣布鞋，连手表也没有。但他爱书如命，舍得花钱，他常说：“天下最美丽、最可爱的东西莫过于书本。”难怪他年轻时因买书曾向祖父讨钱竟写过血书！祖父为他好学精神感动，宁可一家节衣缩食而愿倾囊相助。他藏书甚多，除一般典籍外，还多有善本、珍本、孤本。他在家时，住室是四面书墙，去台居师大宿舍则坐拥书城。每日读书写作不少于八小时，有时竟达十二小时以上。他认为读书无秘诀，贵在多读、多温习、多思考。他对诸子百家著作，无不旁搜涉猎。对十三经、四史，每年都要重温一遍。

他一生操觚不懈，著作等身。除成名作《〈史记会注考证〉驳议》（1986年7月长沙岳麓书社再版）外，其主要著作已

出版的有《殷历谱纠谲》（1954年由台中中央书局出版）、《历术巵言甲集》（1960年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刘歆三统历谱证舛》、《卜辞姓氏通释》、《殷契类选》、《殷契新诠》、《殷周全文汇纂》、《说文正补》、《静廔纤议》、《周金疏证》（宗周钟）、《假借溯源》、《转注释义》等。未出版的有《史记广注》（不悉稿存何处）、《周金疏证》初编至四篇（稿存台湾科学委员会）、《殷契新诠》（修订单行本）、《文字析义》等。其它有关尚书、训诂、文字、卜辞、彝铭、历术等方面的讲稿、文选，积案盈箱，有待其门生整理后，再行刊布。

积劳成疾而逝　弟子编纂痛悼

父亲晚年时，除繁重的教学和著作外，还因耄耋之年的祖父（随父亲去台）中风缠绵，病榻经年，神智不清而加重了家务的负累。祖父的衣食洗漱和处理便溺都是父亲躬亲为之，每天难有三五小时的睡眠，仍然坚持讲学。他逝世前一年某夜，在课堂讲授文字学，消瘦的面颊发青，嗓音不象往日洪亮，正要上台板书，突然倒地不起。经师生抢救后送他回了宿舍。学生周益忠等随即送药上门，却见他并非卧床休息，而是在看书寻资料。他逝世那年有次上课，向学生答礼后，即“扑通”一声坐下，身子斜靠在椅子上，揉着眼说：“昨晚，父亲的病情恶化了……我又有一个问题要研究，查考了许多资料，一直弄到四点多钟才入睡，太疲倦了。”他长长的嘘了一口气后，如梦方醒，“哦，我讲到哪里了？”他提高嗓音接着讲课。第一节课后，班长和几个同学拥到教师休息室，请他下节课休息，他说什么也不依，强作镇定，

坚持授完了课。学生邱财贵说："先生的生命，就在这热情奔放的教学工作中，暗暗地透支了。"1977年12月19日，他正撰写《文字析义》一书，不及终稿便因脑溢血而掷笔，与世长辞了。

翌日，他的入室弟子王魁、逯耀东两教授闻讯，分别从南朝鲜和香港赶到台北奔丧。追悼会上，约有两千位他生前的友好、学生向他的遗体鞠躬告别，许多学生哭得声音沙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40位入室弟子（其中教授过半）穿着白色孝服，跪在灵堂前向来宾答谢，以代行人子之礼。当时台北各大小报纸和有关学术刊物，都发表了他去世的消息和纪念文章。

嗣后，台湾师范大学为纪念父亲，专设图书室，除陈放父亲藏书外，门弟子还塑父亲铜像置其中。还有他门生20位教授捐资，建亭立碑于其墓侧。每年清明及忌日，弟子们去坟前祭祀哀悼，络驿不绝。1986年台湾教师节前，时任教育部长的李焕（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在发表谈话中，说他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有两位，其中一位便是我的父亲。他深赞父亲博学，对他影响很大。

堂叔佶昌在台湾，与父亲过从甚密，他来信说，父亲非常思念大陆的妻室儿女，入殓时犹未瞑目……但愿祖国早日和平统一，从此结束这类悲剧。

（作者注：本文所述父亲在台湾的情况，是辑台湾报纸和父亲生前友好、学生来信而编写的。）

1988年中秋

重庆忆旧

罗大周 *

抗战末期，我正进入少年，作为随军家属的我，因生活流徙，影响学业，父亲（罗念前，当时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付主任兼第一科科长）便派人把我送到大后方的重庆读书。

当时，在重庆中央军官训练团担任总务处处长的陈中传，是父亲在修业小学、修业高级农业学校的同窗好友。他俩毕业后，同进黄埔军校学习，又同参加北伐战争。陈母无女。我母姓陈，年幼丧母，陈母收我母为义女，故我称陈母为外婆，称陈为大舅。陈无子，待我如亲外甥。我到重庆读书，也是他所建议的。

在中正小学哺育下

大舅接我到复兴关——中央军官训练团驻地。复兴关是当时国民党的军政中心，上关要踏数百台阶才到关门。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蓝色的大木牌上写着"顶天立地，继往开来"八个大字，惹人注目，曾给我以激励。1943年8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的子弟学校——中正学校，在小学部读高小五年级。这所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学生

* 罗大周系长沙市郊区黎托中学教师。

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军官的遗族，他们生活、学习全部享受公费优待；一部分是在役军官的子弟，必须经过严格考试，按成绩编班入学；还有一部分非军官子弟，经严格考试后，择优录取。全校师生员工大约有五千多人。

开学时，陈申传雇了一辆马车，派副官张民兴送我，经两路口、上清寺、九龙坎而到座落在覃家岗的中正学校。一进校门有一大广场。进门不远的花坛上，耸立着蒋介石披氅大塑像。张副官领我见了黄雍校长，并递上爸爸给他的亲笔信。他对我说："你这次入学考试的成绩挺不错呀！……你爸爸在南京中央党部工作时，我见过他，文武双全的，你要象你爸爸那样才好呵……"黄雍校长当时已是中将阶级，待人温和可亲。黄伯母还热情地留我们共进午餐。

中正学校的校歌就是黄埔军校的校歌。歌词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亲爱精诚，继承永续，发扬吾校精神。"这首歌，词与曲激昂庄严，我们学生人人会唱。

有一天，远征军200师师长杜聿明来校招收远征缅甸的青年军。他亲自作动员报告，讲国际形势，介绍缅甸战场实况。他说："日军虽然顽强，但只要中、英、美联合作战，完全可以打败它！"他列举班超投笔从戎等爱国英雄事迹，激励大家报名参军。在谈到战斗生活时，他说，缅甸的蚊子又大、又多，咬人很厉害，但有美国供应的药物，可以消灭蚊害……。晚上，学校演出了郭沫若编写的歌剧《棠棣之花》，讴歌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姊弟。当剧中人聂莹高唱"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化为红花，开遍中华……"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动得流下热泪。之后，中学部学生踊跃报名参军。他们戴上红花，坐上军车，在军乐和鞭

炮交响的热烈气氛中告别我们，奔赴战场。

我在中正学校读书两年，每期有3次考试（两次月考，一次期终考），加上入学考试，一共取得13次第一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小学部。

南开学友白先勇

1945年9月，我考入座落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南开学校原在天津，办有小学、中学和大学。抗战爆发后迁重庆。校长张伯苓是一位老教育家，后出任国民党教育部长。当时国民党某些高干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弟，都以考入南开学校读书为荣。

我的同班同学白先勇是白崇禧的长公子，面色白里透红，长得十分英俊可爱。我们同寝室，他睡上床，我睡下床。俩人同在一个棒球队和童子军小队。童子军夏令营活动也同住在一个帐篷，都装有一台矿石收音机，爱收听音乐。由于兴趣相投，俩人形影不离。

白家信奉伊斯兰教，白先勇是个不吃猪肉的清真教徒。有次在沙坪坝街上散步时，我买回几个猪油煎饼，晚间肚饥时也给他吃了。我逗弄地说："这饼儿好象有猪油味……"白先勇怔住了，一时喉管里"哇哇"的，想吐也吐不出来。看他那股难受劲儿，我赶忙解嘲说："你看鲁智深和尚，大吃猪肉、狗肉，气力过人……"白先勇才笑了。

白先勇对待同学热情诚恳，他家里有些美国军用药物，常带给生病的同学，并详细告诉服用的方法。

我与他已隔别40多年，窗友之情难忘。他现为美籍华人作家、美国加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有小说《谪仙记》等。

表兄沈醉　文武双全

我在重庆三年的学生生活中，寒暑假及星期天大多在大姑（罗念慈）家度过。大姑夫黄德曾在军统局总务处任庶务科科长。总务处处长沈醉的母亲与我大姑母是叔伯姊妹，沈称黄为姨爹，我称沈为表兄。

黄、沈两家都住在观音岩下，屋舍简朴。沈家住的是几间小木屋，有时我去沈家玩耍。沈醉的母亲我也叫姑妈，旧社会的女人特别看重娘家的人，她非常喜欢我。表嫂粟燕萍（沈醉的前夫人）是长沙东乡人，清秀美丽，举止大方。母亲曾告诉我，沈醉少时家境贫寒，能够耐劳吃苦。当时他已是少将处长，不抽烟，不喝酒；会开车，精射击。我亲眼看他枪击飞鸟，真是百发百中。他擅长缝纫，表嫂生育哺乳穿的专用衣（乳房前开口）是他裁剪缝制的。他还能打字。我看见他打文件，动作娴熟。

1944年4月1日，我随姑丈到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去玩。那天正是军统局成立纪念日，召开大会，由沈醉主持会议。我还看见戴笠，他个儿不高，说话时歪着头，操浙江口音。他说他最近病了，美国药不顶用，还是吃中药见效……。

1946年冬，我随二叔罗念祁（1949年随49军军长李密从云南撤往台湾）由重庆返长沙，飞机票是沈醉表兄替我们买的。在白石驿军用机场登机时，我的行李超重，那次没能随身带走。第二年春天，沈醉夫妇来长沙，住营盘街国际大厦内，将我那超重的行李带来了。这是解放前我们最后一次的会晤。

刘家彝烈士轶事

刘家彝，字如曾，湖北人。毕业于湖北高级工业学校，曾在汉冶萍钢铁厂工作。抗日战争时，该厂迁重庆大渡口，他是该厂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因为他是我大姑夫黄德曾的亲外甥，我叫他如曾哥。如曾哥的父母曾与我们在广东乐昌住一个大院，我按照表姐黄觋思（现在台湾）的口气叫他们七姑爹、七姑妈。

如曾哥常到大姑夫家走往，和我接触也多。他虽与大姑夫是甥舅关系，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他爱唱歌，教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古怪歌》。歌词是："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这歌唱来真怪有意思的。他还告诉我，民生路中苏友好馆有图书、画报卖，又便宜又好。一个星期天，我独自去中苏友好馆了。在阅览厅墙上，我第一次看到马、恩、列、斯的画像。我拣了几本纸张好、图画精美的书买下，带回来被表姐和表姐夫陈树曦（现在台湾任交通部次长）看见。他们问及书的来历，我具实以告。他们告诫我，下次不可再去那里。那是共产党的机关，去不得。我虽不明其理，但又不便再问。

1946年暑假，如曾哥接我到他厂里度假。每天，他给我补习英语，讲解《开明英语》一课。当他翻译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女孩》的课文时，情意真挚，感人至深，我不禁落泪了。他感慨地说："在中国社会中，死于寒冷、饥饿线上的孩子也多着哩！"

如曾哥有个小姑，在重庆合城银行供职，被他发展为地下党员，后该行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重庆解放前夕，小姑

去川北与解放军联络，不幸失踪。

听说如曾哥有一恋人，惜未完婚，他同事把他比作巴金小说《家》中的觉慧。重庆刚解放，他因带领工人拆除国民党埋装在炼钢炉下的炸药，不幸牺牲（那次共牺牲九人。重庆市军管会为纪念被杀害的杨虎城将军和渣滓洞的烈士，以及刘家彝等，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如曾哥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堪与江姐（江竹筠）等烈士齐名，永垂千古！他牺牲时正是而立之年，诚令人万分痛惜与悲愤！

寺庙生活的回忆

胡一宗* 口述

我原名胡斌生，受戒为僧后，法号“一宗”，人们呼我为“一宗和尚”。

解放之初，我虽然离开了寺庙，定居在今长沙市郊区望岳乡的谷山冲，可是我在解放前的三十余年的寺庙生活，终生难忘，不时勾起了一些回忆：

一、投身佛门

我于1914年出生，原籍湘潭县石潭乡。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周氏带着我兄弟4人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折腾。长兄伯高14岁时，托保介绍到长沙市南门外铜元局做工。不久，贺龙来局号召当兵闹革命，他和十多名青工一道参加了军队，一去杳无音讯。二兄仲良才12岁，送到长沙市北门正街文乐忠堂铅印局学徒，因无家可归，加上老板的折磨，环境的逼迫，变成了疯子，流落异乡。三兄春生，10岁时，被迫送到洗染店当童工，因房屋倒塌而惨遭压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的一家就是这样的流离失所，悲惨凄凉！

我母亲因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认为“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郎。”于是，我母子二人投身到长沙市北门外

* 胡一宗住望岳乡窑矿村，现年74岁。

开福寺，赖佛逃生。她削发为尼，我拜超尘长老门下为徒。

开福寺是长沙著名古刹，山门高大雄伟，上方刻有“古开福寺”四个大字，两旁刻有“紫微栖凤，碧浪潜龙”的对联，是当时著名书法家韩尌题写。我听长老说，早在唐末五代时，建都长沙的楚国国王马殷的一个儿子重病，某日打从铁佛街土地庙经过，儿子叫口干，便到庙里讨口水喝。修行的保宁勇禅师画一碗“神水”给他喝了，于是病愈得救。马殷为酬谢保宁，问其有什么要求。保宁要求马殷作为施主，在会春园里修建一座寺庙。马殷欣然应允，便在会春园建起了开福寺。由于保宁是开福寺的创始人，佛教内部习惯地称他为“保宁勇祖”，是开福寺的祖师。

我进寺不久，长老看我年幼无知，送我到教养兼施的湖南佛教慈儿院读书。慈儿院办在开福寺右侧，是1915年由开福寺发起创办的,创办人是宝生和尚、竹林和尚、空也法师。了凡和尚（1949年任中国佛教会湖南省分会理事长）和长沙市的资本家黄石逸担任院长。长沙八大丛林捐谷600担作为开办经费。“丛林”就是僧徒聚居较多，象山林丛集一样的地方。当时，长沙的八大丛林是：北门外开福寺、市内仓后街上林寺、河西的岳麓山万寿寺、谷山冲宝宁寺、坪塘桐溪寺、白箬灵云寺、龙洞华林寺和靖港团山湖杲山寺。慈儿院的经费如有亏损，可造具清册报湖南省教育厅补贴。它招收的对象是社会上的孤儿，吃饭、穿衣和书籍课本，概由慈儿院供给。起初只有四十名学生，两位老师，一个职员。后来发展到一百名学生，七个教职员，授以初小课程，早晚拜佛和唱佛教歌曲。每天早上集合整队，唱完歌后，入食堂进餐。晚上集合整队，唱完歌后，入室就寝。这歌词开头是“我

佛世尊，示现迦毗，雪山修道，六年禅定……”结尾是“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在食堂进餐时，不但要做到“食不语”，而且还要求听不到碗筷和咀嚼的声响。

和尚的主要任务是念经，没有文化不行。我在慈儿院虽然读过四年书，有了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但还不够用。1924年，长老又送我到南岳祝圣寺所办的南岳佛学讲习所读书三年。讲习所创办的目的，是培训僧徒通达佛教教义。讲学的都是些老法师和老和尚。课程有佛学、国文、历史、地理等。如解释“佛”字，老师说：“佛者觉也，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义，实际上佛学也是一种哲学。”至于讲习所的生活是艰苦的，每餐只一饭一菜而已。

我投身佛门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度过了七载。

二、受戒为僧

1927年，我13岁便正式受戒为比丘（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受戒”是受佛所制定的戒律，戒条繁简不一，最初都要受三皈（佛、法、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男的受沙弥戒、比丘戒；女的受长弥尼戒、比丘尼戒。还有什么菩萨大戒等。

开期放戒是寺庙里最大的佛事活动，各地僧徒云集，不下千人。受戒之前，要学习两个月，“打念佛七”（集体念佛七天）。在此期间，发心出家，抛弃红尘，摒除私欲，从此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以了生脱死。当时，我年纪轻，同大家一道，趋步相随。正式受戒这天，庙堂张灯结彩，布置一新，气氛显得庄严肃穆。我们在大雄宝殿排队跪

拜，听传戒和尚和教授和尚讲戒律、讲僧人的日常生活注意事项、讲和尚为人处世的道理等等。剃发后，就焚香供佛，俗谓"烧艾火"，用特制的细香在头顶上烧三点到九点。我因年小，只烧了三点。烧的时候不大痛，象蚂蚁钳一样。犹如种牛痘，痂一脱就好了，留下的是白色疤印。受戒后，每人发一张戒牒。戒牒是用大皮纸印的，证明受了三坛大戒。牒上有三师七证的签名，填上日期，盖上一颗珠红四方篆字大印，印文是"长沙古开福寺开期传戒专印"。有了戒牒，就可云游天下，所到寺庙，可享一宿两餐的礼遇。我在受戒时学的一首诗，因为印象深刻，至今未忘，开头四句是："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参。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从此，我就成为开福寺的小和尚，学习早晚功课，学习替人做佛事的敲打唱念。每天早晚有两堂功课，早上念的主要是《楞严咒》，晚上念的主要是《弥陀经》。吃饭时也要披袈裟，叫做"过堂"；还要先念《供养咒》，意思是请佛应供，然后自己才能进食。我在这里有饭吃，有衣穿，朝朝暮暮，暮暮朝朝，念经拜佛，没有其他想法。

三、八 年 离 乱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军大举侵华，长沙经常遭到空袭。僧众默念"阿弥陀佛"强作镇静，内心却是惶惶不安。长沙"文夕大火"，日军有似兵临城下，开福寺已不是清静的佛地了。

加之寺院经费断了来源，僧徒生活无着，只得各自西东。我母子俩逃回湘潭老家，但日久也不是安身之地。我想出云游之计，反正天下丛林是一家。但，母亲年老，行走不

便，就安置在附近的一个尼姑庵里。于是，我跟随难民经衡阳、广西，来到贵州独山。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侵入独山，威胁重庆。我又跟随难民逃到贵定，被县佛教会收留。我在这里帮他们抄写文疏，整理经典，度过了两个春秋。直到日军投降，我回老家接了母亲，重返开福寺。此时，原有僧众均陆续归来，开福寺恢复正常秩序，依然暮鼓晨钟。

湖南佛教慈儿院即时复课，我被派到院部担任会计。我曾在这里受过四年的启蒙教育，终生难忘，而今派回母校工作，深感荣幸之至。我的主要任务是登记收支帐目。因人员不多，帐务简单，工作较为轻松愉快。

四、在 谷 山 寺

1946年，我在谷山寺担任总管，管理寺内外一切事务。那时，寺里办了一所小学，因谷山寺原称宝宁禅寺，故学校名宝宁小学。学生都是谷山附近的农民子弟。学校只有一个复式班，40名学生。在谷山寺香火田中拨出40元，作为学校经费。我是寺里总管，兼任学校校长。开学和放假时的行政事务由我负责安排，平时教学工作聘有老师担任。

谷山寺在今长沙市郊区望岳乡的谷山冲。谷山是长、望、郊交界之地，峰峦起伏，林壑优美。谷山冲之间，泉甘而土肥，宁静而幽邃。左有青龙山之护，右有白虎山之雄，前有朱雀大塘之照，后有玄武高山之屏。谷山寺的修建规模和形式，全仿开福寺。两寺隔河遥遥相望，都是长沙市名刹。

我看过寺院留存的《莲池谱》，上记载着明朝朱元璋

做皇帝后，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居北京；封第十九子朱穗为谷王，居长沙。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继承帝位，锐意复古，诸王不服，便想把诸王削除。燕王朱棣乃举兵南下。号称靖难军，攻陷金陵，赶走朱允炆，自立为帝。朱棣怕长沙谷王朱穗争权，命将军金甲率兵把他杀掉。老臣程吉得知，赶车前往相救，说服了金甲，谷王得以免难，乃抛弃红尘，决心修道，在谷山重修宝宁禅寺。谷山原名云母山，因谷王在此出家修行，久而久之，人们便把此山呼为谷山，把寺呼为谷山寺。

若再寻根溯源，谷山寺是唐代禅宗僧人谷山藏禅师创建的，地方志上有记载，其人在《五灯会元》卷六有传。另有一个说法，认为开山祖师是保宁勇禅师，他在五代时期楚王马殷的支持下，修建了开福寺之后，发心朝拜各地名山大寺，云游三十年之久，方返回开福寺来。当时开福寺招待来往僧众的"知客"，因年久未见，认不清楚是保宁勇禅师，便当作一般云游僧众接待。第二天早餐时，首座长老一眼认明了是本寺开山祖师保宁勇禅师，遂鸣钟击鼓，召集僧众，以礼相迎。保宁勇禅师不慕名位，乃渡江而住河西大冲土地庙，立愿在这里再建一寺院，以方便云游僧众。于是又找马殷为施主，鸠工集材，修建了寺院，敕封为"宝宁禅寺"。谷王为在谷山重修寺宇，就把大冲的宝宁禅寺迁了过去。今望岳乡谷峰村大冲的李家大屋场即原宝宁禅寺基地，现还有"山门大丘"的田名。

谷山寺与开福寺有其历史渊源，关系密切。我来往于两寺，度过了我的前半生。

五、脱 袈 归 田

党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对寺院保护。我在1949年解放后，照常念经拜佛，毫无顾忌。1951年土改，农民反封建、分田地，谷山寺的菩萨也被砸碎，钟、鼓、磬和铜佛铁像全被运走，还有两柜宣纸铅印版本的经、律、论等文章的《大藏经》均付之一炬。谷山寺原有360石香火田分给了农民，寺里10多名僧徒生活无着，相继离去。我母子二人就在谷山冲落户，分了田地房屋。从此，种地耕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丁冰玉记录整理）

封面题字　周昭怡
封面设计　张子清

长 沙 郊 区 文 史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 部 发 行）
责任编辑　李炎坤
长 沙 市 华 中 印 刷 厂 印 刷